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林洋港的思想進程與中國

Lin Yang-gang and China--History, Career and Choice



林儒暘

Ju-Yang Lin

指導教授：石之瑜 博士

Advisor: Chih-Yu Shih, Ph.D.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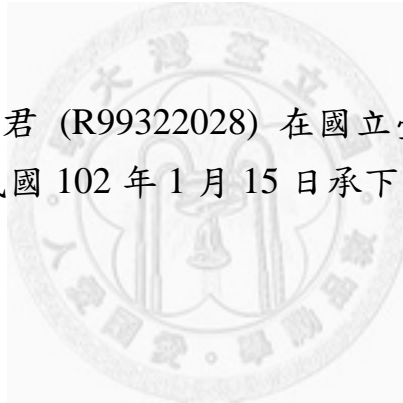
Jan, 2013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林洋港的思想進程與中國

Lin Yang-gang and China--History, Career and Choice

本論文係 林儒暘君 (R99322028) 在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02 年 1 月 15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石之瑜

(簽名)

(指導教授)

吳文星

何靜儀

謝辭

能將這篇論文完成，首先要感謝石之瑜老師、吳文星老師以及何輝慶老師三位老師對我的指正與建議，讓我撰寫的過程中，得以對自己的盲點與不足之處進行修正，特別是我的指導教授石之瑜老師，在和老師討論寫作的難題時，老師總不厭其煩地給予我建議和方向，並花費不少時間和我討論各種的問題與可能，讓我順利的解決各種難題，對此銘感五內。

其次要感謝在研究所時期認識的所有學長姐們，總是給予我許多支持和鼓勵，以及夢荷、欣茹、翊豪、瑋豪等同學，讓我在這段期間有了傾訴的窗口，並總是用正面積極的態度來給我加油打氣，讓我在研究所的生活中，有了依靠。還有說研社的廷諺學長、智偉學長、瑞源學長、光珩、蕭遠、家慶、雅雯，認識已經快要十年，一路上始終給予我各種幫助，在我低潮時給了我勇氣與走下去的動力，對所有幫助過我的人，表達我的感謝之意。

最後，將這本論文獻給我最親愛的家人。

林儒場 2013 年 1 月

摘要

林洋港是台灣政治史上著名的臺籍政治菁英，出生並成長於日本殖民時期的臺灣，接受日本的教育，熟稔日語，卻有著對中國的認同，在臺灣光復後成為中華民國的基層官員，並成為國民黨的重要人物。

本文敘述林洋港所處的時空背景，以了解當時客觀的社會環境；而因個人接受的訊息皆為單一個案，因此必須對林洋港個人的主觀認知進行分析，以了解林洋港所認知的世界。因此本文對林洋港在日本殖民時期的生活，以及臺灣光復後的發展、成為政府官員後的行為作出整理，梳理出林洋港的中國認識脈絡與發展並與李登輝作出比較。

本研究旨在分析林洋港如何接受與理解所得之訊息，進而發展對中國的認識。本研究發現，林洋港在長輩的敘述和親身的經驗中對日本有著負面的印象，而對中國有了歸屬感，實際接觸中華民國政府的官員和領導者後，強化了林洋港對中國以及身為中國人的認同。

關鍵詞：林洋港、政治菁英、國民黨、中國認識、李登輝

Abstract

Lin Yang-gang is a prominent Taiwanese political elite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s political history. He grew up when Taiwan was under the rule of colonial Japan. While he received Japan's education and spoke fluent Japanese, he identified largely with China. After Taiwan was returned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after World War Two by Japan, he became a grass-root employer of the government and eventually a critical figure of the Kuomintang party.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background of Lin Yang-gang to understand the objective social environment of his time. However, since these messages are mostly from individual cases, there is the need to analyze the subjective cognitions of Lin Yang-gang to understand how he views the world. Thus, this article goes through Lin Yang-gang's life under the colonial Japan rule, how this life changed after Taiwan was returned to R.O.C., and how he acted as a member of the R.O.C. government to organize the above into Lin Yang-gang's perspective on China and how this perspective developed. I would also compare this development of perspective with Lee Teng-hui.

This research aims to analyze how Lin Yang-gang received and understood messages and how they developed into his perspective on China. This research discovers that because of elders' descriptions on Japan and his own experience, he had a negative image on Japan, which leads to his sense of belonging on China. After he actually worked with the officials and leaders of the R.O.C. government, Lin Yang-gang consolidated his identification with China and his sense of identity as a Chinese.

Keywords: Lin Yang-gang, political elite, Kuomintang, perspective on China, Lee Teng-hui

目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謝辭	II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	IV
目錄	V
圖表目次	V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2
第三節 研究背景	4
第四節 相關文獻探討	6
第五節 研究理論與架構	10
第六節 研究方法	12
第七節 章節結構安排	14
第二章 生平經歷與抉擇	15
第一節 時代背景	15
第二節 成長經歷與抉擇	23

第三節 價值觀的構成.....	31
第四節 個案比較.....	39
第三章 思想內容與源流.....	45
第一節 中心思想.....	45
第二節 思想的源流.....	53
第三節 個案比較.....	62
第四章 中國意識與印象.....	67
第一節 中國之概念.....	67
第二節 身分認同發展.....	69
第三節 想像中的中國.....	78
第四節 個案比較.....	82
第五章 結論.....	88
參考文獻.....	91

圖表目次

圖 1-1.....	11
圖 1-2.....	12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臺灣和中國大陸的恩怨糾葛淵遠流長，兩者關係不能一言以蔽之，在政治面、經濟面、文化面都各有難以切割的脈絡，有關雙方之間關係的論述雖有著為數不少的解釋，都傾向將兩岸視為兩個整體或採用單一化的標準進行分析評價。而這些論述解釋不僅代表不同的立場、意見，甚至延伸到文化、語言之間的角力，並同時在臺灣內部造成了紛爭與對立，以至任何將兩岸各自整體化與視角單一化的作法都難以為繼。臺灣和中國在地理位置、歷史背景、經濟成長、文化背景都有著一定程度的共通性，即便在政治上雙方是個別獨立的實體，但兩方的一舉一動仍然會容易觸碰到對方或自己內部或之間多元且變動的敏感神經。不論中國是臺灣的祖國、敵國又或是單純的一個鄰近國家，在臺灣生活的人民都無法對於中國大陸視若無睹，而要探究兩岸的關係、理解臺灣社會發展的脈絡，就必須正視以個人為主體所構成的歷史，對臺灣過去的發展以及方向交錯且不斷變動的走向作出剖析。

中華民國政府在中國大陸失利後退守臺灣，開始了將近 40 年的戒嚴時期。爾後兩分化的兩岸觀點肇始於焉，這時期以外省人為主體的威權統治讓不少在地人民失望喪志，為了解決省籍問題，蔣經國提拔臺籍人士進入政壇。同樣是在這個時期，臺籍人士對於研究臺灣、中國、甚至日本的相互關係都極為重要，因為這個年代的臺籍政治菁英都經過日本殖民統治的教育，而在本省籍的身份下為外省集團組成的政府工作，這些臺籍政治菁英成了本省人士的希望和指標。但同時他們受過日本文化的洗禮，戒嚴時期對於中華民國政府的認同，和對自我省籍的身

分，他們的身分認同複雜，但卻是領導臺灣走過戒嚴時期邁入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石。由此可見，相似的遭遇與個人化的路徑同時在起作用，用時代背景作為他們共同的基礎因而是必要，但卻不充分的。

固然在臺灣戒嚴時期的臺籍政治菁英，被重用的主要原因是為了平息省籍之間權力過於不平均引發的民怨，但這些臺籍政治菁英進入國民黨政府後，各有著不同的理想與仕途發展，分別具都有著某種指標性的意義。不過畢竟因為他們代表著多數但卻被壓抑的本省人民，所以個人在其間所起的作用往往未被正視。比起外省集團，這些臺籍政治菁英有著複雜的認同問題，像是究竟自我認同為日本人、中國人、還是臺灣人的問題，無法以簡單的中國和臺灣的詞彙做出解釋。在解除戒嚴邁入民主後，他們的自我認同、一舉一動不僅代表著支持其理念的臺灣人民，同時也在影響著臺灣人民。

臺籍政治菁英當中，聲望極高的林洋港，正是本研究的對象。林洋港是知名政治人物，經高考進入南投縣政府，從基層開始其政治生涯，歷任南投縣長、建設廳廳長、臺北市長、司法院長等政府要職，一度成為蔣經國接班人的熱門人選，最後在 1996 年後退出政壇，不再從事政治活動。林洋港的價值觀念以及他的自我認同、中國觀念、政治理念如何形成與開展，是追蹤兩岸關係所不可忽視的課題，故分析林洋港先生所認識的臺灣與中國並了解其中的認知與抉擇，是把歷史還給個人的重要步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

過去數十年來，國家認同的問題一直困擾著臺灣政壇，不僅僅是充斥著不同的立場和意見，甚至造成了臺灣社會內部此起彼落的敵對和仇視，使得臺灣和中

國之間的關係，在情感體會上既緊密卻又陌生。本文針對身為本省人、受過日本教育、加入國民黨成為臺灣籍的政治菁英的林洋港，在如此複雜的情況下是如何形成了他之後對於中國和自我身分的認同。其中值得關注的是，在他的認識中，是否有著流行的外來政權統治臺灣的判斷？臺灣與中國間文化、人種、語言、主權的複雜關係，在林洋港的思想中又是一個怎樣的的存在呢？林洋港是個擁有強烈中國認同的臺籍政治菁英，是經過怎樣的想像與實際經歷，讓林洋港接受中國的論述？林洋港對中國文化的接觸過程與深淺、和具體的政府領導人的相處過程以及中國的印象由想像到實際的接觸，將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本文所要處理的問題，是關於林洋港的中國觀與價值認同，首先必須了解分析林洋港的生平事蹟與背景，包括他在甚麼樣的年代下受到甚麼樣的教育，他對於歷史事實的思定和價值觀的來源，最重要的是林洋港個人的認知，據此便必須分析林洋港的政治思想與對中國的認識。更精確的來說，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以下幾點。

壹、確認林洋港的生平經歷與思想

在進行各種分析之前，必須先行確認林洋港的整體成長、仕途發展的經歷以及他是否擁有中心思想，如此才能確定，不論是自認或是他人對林洋港的評語，能否符合當事人事後回憶的內容。比如林洋港自認深受儒家文化影響，他何以如此自我評價？與其現實言行又是否符合？所謂的儒家文化又是指甚麼？等等均在探究的是林洋港所認知的世界意涵是情境性的或跨情境的。

貳、分析形塑林洋港思想與行為的各種背景

同樣經過日據時期的日本教育和國民黨政府來臺後的威權統治，每個人的身分、國族認同和中心思想都不盡相同，有的人認為自己是日本人，有的認為自己是臺灣人，有的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林洋港的自我身分認同為何?以及背後影響其思想的重要因素為何?必須先確定林洋港所認知的世界是受何影響，才能更深入的探討他在選擇認同策略時所具備的能動性。

參、林洋港的政治思想與對中國的認識

林洋港身為政府重要官員，他的言行舉止不只會受到國家領導人和一般人民的影響，同時也會去感染一般人民，於此，林洋港對政治的認知與理想就會很大程度的影響臺灣社會的發展，而其政治思想同時也反映了人格表現與對現實的認知。其間無可避免的重要內涵是林洋港對於中國的認識。國民政府遷臺後，到現在對於中華民國政府的論述仍有許多，身為政府一員的他，面對政府困於中華民國、臺灣之間難以劃分出一條清楚的界線，則林洋港如何決定，中國代表著甚麼，以及中華民國政府又是甚麼?這是本文另一個重要的分析目標。

第三節 研究背景

林洋港出生於 1927 年，生長在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對日本的印象接受於長輩對日本的反感與鄉里間日本警察的蠻橫，即便從日本留學歸國後也未對日本產生憧憬。臺灣光復曾讓許多臺灣人感到一線希望，但在接收官員的傲慢下轉變為


失望，林洋港因為現實問題才在擔任南投縣行政課長之時加入國民黨，從此開始了他的政治旅途，並一步步走向農家出生的他所未曾想到的政治高峰。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以殖民地的方式治理臺灣，獲取臺灣的各種資源輸往日本本島，並因應戰爭的爆發，發展臺灣為日本的南進補給基地。在經濟上，殖民政府驅逐外國資本使臺灣和日本產生更直接的經貿依存。其中三井、三菱等大企業和國營的方式獨占林業、鐵路、鴉片、樟腦等關鍵資源，並出產各種資源到日本本島，日本本島則一直存在著嚴重的稻米問題。¹1930年後，由於戰爭的需求，殖民政府對臺灣進行工業化，發展合金、造船、汽車等相關行業。除了官方獨佔的這些重要產業外，私人企業也多由日本人所經營，此時臺灣人民主要為農民和勞動階級，在經濟上受日本人的強力支配。雖然臺灣在各項基礎建設方面有所發展，但主要是為了日本的需求，在殖民地的模式下所發展。在政治層面，日本人對官吏的獨占，強化了對臺灣統治的專制性，並吸收少數臺籍人士成為警察或其他基層職員以方便對臺管理，雖然有臺灣總督府評議會的設立，但僅為諮詢機關，並無決策的權力。而在社會上，日本人與臺灣人形成兩個階級，不論在教育或是職業選擇、仕途發展方面都有極大的落差，官吏公務員、資本家都為日人獨佔，臺人多為農民和勞動者。此外在皇民化政治下，臺灣人需要學習日文、說日語、信奉日本神道，蓋殖民政府希望以文化上的力量強化日本對臺的統治，儘管如此，日本人和臺灣人卻仍被差別對待，在法律和政治領域的學習上有諸多限制。不論在政治、經濟和社會上，日本人都以壟斷特權的方式對臺統治，一切的治理行爲都是為了日本本國的利益，對臺灣進行多方面的徵收。

日本戰敗後，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此時民生經濟混亂，政治上改由外省

¹ 林明德，《日本近代史》，（台北：三民書局，2006），頁 165、174。日本稻米問題嚴重，1917年發生搶米危機，1920年米價暴跌，1940年開始，砂糖、白米等陸續成為配給品。

集團掌權，臺灣學童雖然在教育上已不如在日據時期受法規歧視，但臺籍菁英在政治的參與上仍然無法進入決策核心，加上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一時人心惶惶，以至社會普遍對於國民政府並不信任。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退守臺灣，臺灣進入戒嚴狀態，國民黨在臺灣的威權統治正式開始。此時臺灣通貨膨脹嚴重，外省精英以優越的心態和姿態治理臺灣，實則來臺的軍人、官僚素質低落，何況在經過二二八事件後，臺灣人民大都敢怒而不敢言，面對這些問題，中華民國政府開始一連串的改革和重建，如新臺幣的發行、土地改革、基礎建設的拓展等等，並以「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為口號，積極準備反攻大陸，在李登輝就任總統後，兩岸的關係開始出現轉變，一個中國已不再是唯一訴求，中華民國政府不再執著於反攻大陸，而朝著本土化發展。



第四節 相關文獻探討

壹、自傳與他人記述

關於林洋港的書籍並不多見，部分為林洋港口述，他人代筆的自傳，或是作者對林洋港進行側寫的傳記，內容以林洋港的生平經歷為主，其中包括成長背景求學歷程、政治生涯和生活上的小故事為主，而以其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論文則譬如黃鈺淳的博士論文《在台灣與中國之間－李登輝的思想脈絡及其中國認識》，以認同循環理論比較了李登輝、林洋港、彭明敏、史明以及胡淑裕以林洋港、孫運璿等人進行大眾媒體中人物形象的個案分析，但都不是以林洋港為主軸進行研究。

《李登輝與林洋港》（1987）是收錄對當時臺籍政治菁英當中最為亮眼的李登輝和林洋港的文章集錦，對於林洋港的政治發展、政治風格和家庭生活都有闡述，

多為作者的觀察與側寫。

在廖慶洲所著的《林洋港的奮鬥與歷練》(1988)中，作者不僅訪問林洋港與其周遭親友，更親自到林洋港的南投家鄉觀察林洋港的生長環境，書中詳述了林洋港的生平事蹟與他人對林洋港的看法，以林洋港深厚的修養、機智的談吐、清廉從政、優秀的行政能力等，視為林洋港成功的諸多原因，本書並得到林洋港的長官同時也是好友的歐樹文先生認同，對林洋港的行事作風有很清楚的描寫。

而賴樹明先生所著的《林洋港傳》(1993)，以林洋港的生平事蹟為寫作重點，從林洋港的童年時期到司法院長為止，詳述了林洋港溫和的處事態度和在政治生涯中的各種表現，內容更側重林洋港在政治上的事蹟，並有許多林洋港對於政治事務的心得與看法。

《誠信——林洋港回憶錄》(1995)是在林洋港政治生涯末期，由官麗嘉對林洋港進行訪談所作，由林洋港回憶其人生中的點點滴滴，小至幼時在鄉下捉蝦捕蟲，大至二月政爭的回憶(後詳)，並有許多林洋港對日本、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等人的回憶與敘述，以及對於省籍、中國問題的見解。本書對於林洋港的處事態度與誠信、熱心和直率的人格作出極高的評價，且對於分析林洋港對中國、臺灣的認識以及政治思想和處事態度而言，這本著作提供了非常詳細的內容。

在由林洋港的三女兒——林明玲所著作的《戴斗笠的父親——阿港伯》(1995)中，作者以女兒對父親的認識，來描述她眼中林洋港最真實的樣貌和對兩岸關係的見解，可以讀到林洋港表裡如一的誠信態度，如同其他書籍，本書描寫的林洋港也都如出一轍，幾乎沒有衝突之處，書中林洋港一家兩袖清風的生活更是難以想像，而其中批露林洋港子女的事業發展，林洋港身為政治權力的核心，並未為其子女謀取一官半職，而要求子女自己尋找工作，在臺北數十年也未有任何房產。

這些傳記書籍內容大多一致，對林洋港體會儒家文化所呈現的溫和、謙恭、誠信的特質都有敘述，這些傳記刻劃了一位純樸的農家子弟慢慢走向政治核心的過程，其中沒有狡詐，沒有權謀，只有苦幹實做的模範政治家的身影。

貳、林洋港的政治思想.

關於林洋港政治理念的著作不多，《林洋港邁向總統之路》(1993)一書為徐策對於成為司法院長後，少在螢光幕前出現的林洋港未來動向的推測。本書分析林洋港的從政優勢和當時的政治環境，並以參選總統為未來走向為前提，對副手和黨派聯盟提出見解。本書偏重在政局事件層面，此時林洋港仍未宣布競選總統，但本書已就競選總統一事提出意見。

《林洋港的總統之路》(1999)是林洋港競選總統時，擔任林洋港秘書的張曼溪所著，書中內容著眼於總統大選期間所面臨的各種問題與林洋港的各種作為，雖然多為選舉策略的描述，但仍有許多林洋港面對各方意見、壓力、信念的處理方式，如美國總統可在白宮接見林洋港，但林洋港為了避免國外勢力介入，破壞符合民主公平原則的總統選舉而婉拒，這些事件對於我們研究林洋港的政治思維有不小的助益。

對觀察林洋港的政治思想最重要的兩本書，是《我心如秤——阿港伯在司法院的日子》(1995)和《新領導：林洋港的治國藍圖》²(1996)。其中《我心如秤——阿港伯在司法院的日子》一書，是林洋港回憶1987年到1994年這7年間在司法院的改革，包括司法風氣、硬體設備的改進、簡易庭的設置等等，在提到少年犯罪節節攀升以及名言——皇后的貞操時，都有再重申其理念，並附有關於二月政爭和兩岸關係的見解，文中可見林洋港對於正確的事的堅持與對司法改革的貢獻。而《新領導：林洋港的治國藍圖》一書，是在總統大選時期所出版，內容包含憲政、婦女、兩岸關係、國防、外交、財經、社會、司法、教育、文化、環保的現狀見解與未來的理想走向，可說是包含了林洋港對政治的看法與見解的重要書籍。特

² 為多位學者與林洋港對談後所彙整。

別在兩岸關係方面，他闡述不急統、不動武、不可獨的理念，不僅包含了林洋港對於中國和臺灣關係的論述、也表示了林洋港對於現實世界的認知。

《別鬧了，登輝先生》(2001)是陸鏗和馬西屏先生對12位知名人物採訪對於李登輝的認知，書中大多著重在各個受訪者對於李登輝的行事作風和行為上的爭議，對林洋港的訪談著眼於二月政爭到總統選舉之間，有助於了解林洋港如何看李登輝的各種作為以及這些批評的衝突點在於何處。

參、林洋港的價值觀

《政治與人生——我的處世哲學》(1992)收錄林洋港在其政治生涯中在各個報章雜誌上的文章，在政治上談論了如何改造社會、社會上目前的所需、眼中的蔣經國等等，在人生哲學上則談論了其座右銘、最有幫助的書籍以及四耐（耐冷、耐苦、耐煩、耐閑）、四不（不激、不躁、不競、不隨）、四毋（毋意、毋必、毋故、毋我）等等的人生體悟。

林洋港在1994年曾到各地演講，題目均為道德重整的問題，其中不談政治，只談道德。《阿港伯開講——重建時代道德》(1995)一書收錄林洋港1994年的數場演講內容，演講對象多為學生，其中講法治、講平等、講不追逐名利的人生觀、講互信互助的道德觀等等。並從演講內容，可見林洋港受到儒學很深的影響，也可見林洋港對於佛學的研究，林洋港在書中闡述了自己的價值觀念，但同時也表現出林洋港對於社會道德價值低下的煩憂。

綜觀群書，對於林洋港的形象塑造都頗為一致，對事件的敘述也無前後不符的情況。在《別鬧了，登輝先生》一書中，林洋港提到了對自我的期許，不是擁有高官厚祿，而是當他人提到林洋港時，能認為這個人是沒有汙點的，在閱覽過關於林洋港的各式書籍後發現，在這些書籍中的林洋港，在行事風格和人品上都

少有爭議點的存在，在分析林洋港的政治思想、中國認知與來源上較容易獲得確切的答案。

第五節 研究理論與架構

本研究第一個重點在分析林洋港的自我身分認同，自我身分認同是一種族群的想像，是由主觀的生活經驗與立場去判斷，族群認同通常都是相對性的，當在界定「我」是誰的時候，同時也在界定「他們」，族群意識包含不同層次的三個內涵：³

1. 差異認知：界定群體間在文化、祖先來源或歷史經驗的差異。
2. 不平等的認知：各群體是否在經濟、政治、社會方面有不公平的待遇。
3. 集體行動必要性認知：面對不公平的待遇，有些人會採取集體行動以改變不公平的待遇，但並非必然發展到此行動。

由此內涵來做分析，確認林洋港在日據時期和光復後，是如何認定自我的身分認同，並以何種要素為界定之標準。

本研究的另一個重點是林洋港的價值觀念與對中國的認知，探詢這個問題的架構應該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林洋港的思想發展，包含人生理念與政治思想；第二部分則為林洋港對中國的認知為何與其成因。

第一部分要了解林洋港的思想源流為何以及這些思想如何被實際言行表現，故必須先了解林洋港在其言行舉止中表露了怎麼樣的文化與價值意涵，而這些價值又是在何種思想源流以及背景中發展而成，其間林洋港開展怎樣的價值觀念，

³ 王甫昌，2004，頁 10-17。

並且在政治上是否有意識的運用這些價值觀。（架構圖如圖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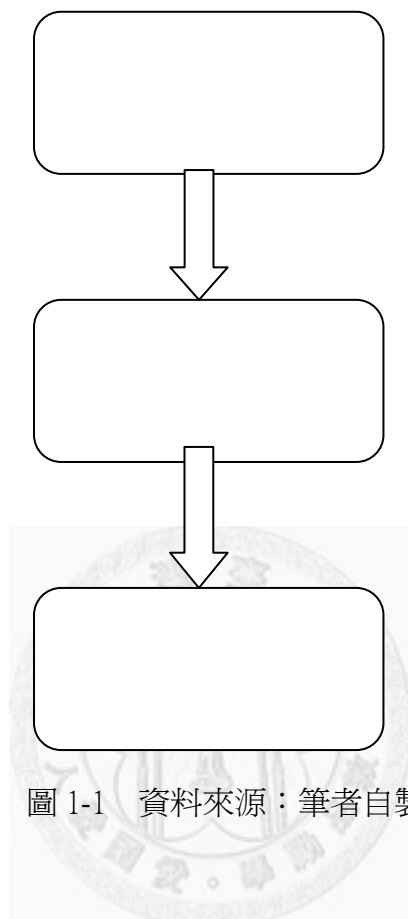


圖 1-1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透過第一部分分析了解林洋港的思想及其源流後，第二部分將進一步分析林洋港的背景、思想源流與他對中國的認知的關係。思想與認知可能會隨著不同時期和背景而有所變化，本文將就林洋港生長的各個不同時期來看他對於人生理念、政治思想和中國認知是否有所不同和改變。（架構圖如圖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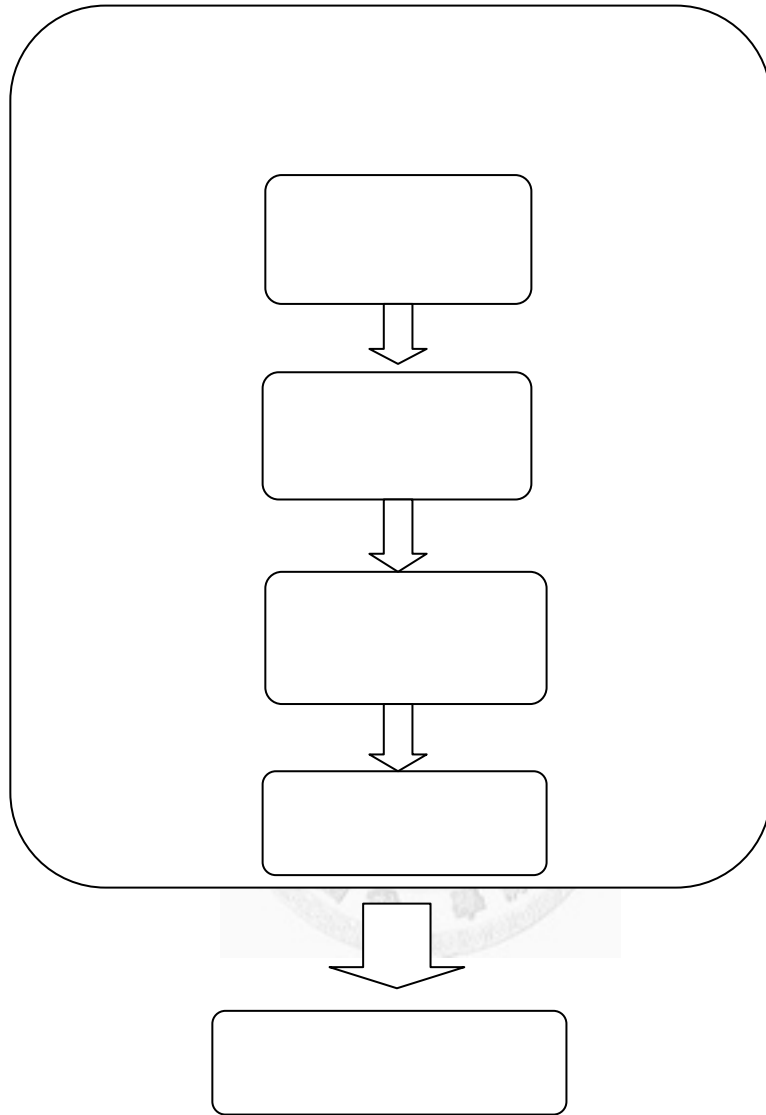


圖 1-2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第六節 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林洋港政治思想與中國認識的研究方法有三，外在研究法、內在研究法、比較研究法；茲分述如下。

壹、外在研究法

外在研究法核心為脈絡法，用意在於從被研究者身處的社會、歷史環境下，了解其是在何種歷史、文化和社會脈絡下發展出思想與認知，而又是在怎樣的脈絡發展下被影響或改變之，並且在此時的各種歷史社會因素下，塑造出了怎樣的氛圍和論述，在這個環境下研究對象是如何受到環境的影響。如林洋港身處日據時期臺灣，卻沒有崇日情結，即使由日本留學歸國也仍然沒有對日本心生嚮往，但卻對於臺灣和中國擁有情感和認同，是甚麼外在因素影響林洋港對於主流觀點的認同與不認同，這就是本文中外在研究法要專注的焦點。

外在研究法有助於了解在時代脈絡下環境的影響，但卻無法完全解釋同時期各個不同個體所表現出來的差異，例如同樣在日據時期出生，接受日本教育的林洋港和李登輝，為何兩者對日本的想法卻大相逕庭。林洋港對日本並無特別崇拜，而李登輝則以自己接受日本文化教育為榮，故仍須以其他的研究法來補助研究的進行。

貳、內在研究法

內在研究法注重個體的自主性，以個人為研究單位，對其思想內涵進行分析，從中分析其文化、政治、自我認同的要素成分，以及其思想內涵在時間軸上與深度上的進程發展，以林洋港為例，林洋港曾提及「不可獨、不急統」的兩岸方針，因何使林洋港有如此想法又是何時產生？但同時內在研究法若過於忽略外在環境因素，將研究對象抽離出時代背景，則難以判別其原因動機，甚至扭曲其原意。

參、比較研究法

最後本文將採取「比較研究法」，比較林洋港與同時期的臺籍政治菁英的思想與認知。本文的研究目的雖然是在林洋港個人的政治思想與中國認知上，但將同時

期的臺籍政治菁英做出比較，可以讓我們發現在同個歷史脈絡和同樣的社會環境之下，這些臺籍政治菁英有著哪些不同層面的差異，以及造成這些差異的能動性基礎何在。

本文在此利用「比較研究法」做為分析與比較與林洋港同時期的臺籍菁英個案之方法。本文選取與林洋港同個時代的臺籍政治菁英做為比較的對象，並尋找與林洋港有類似背景或發展，但不一定有相同價值觀、理念的臺籍菁英做為比較對象，本研究選擇的臺籍菁英個案為與林洋港同為台籍政治菁英，卻有著不同思想理念的李登輝。

第七節 章節結構安排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生平經歷與抉擇

第三章、 思想內容及源流

第四章、 中國意識與印象

第五章、 結論



第二章 生平經歷與抉擇

第一節 時代背景

壹、日本統治下的臺灣

1894年爆發中日戰爭，中國戰敗，隔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臺灣和澎湖被中國割讓給日本，開始了日本對臺灣長達51年的殖民統治，期間經歷過臺灣民主國的成立與及長達二十年的武裝抗爭⁴，但在日本的武力鎮壓下均宣告失敗。林洋港出生於1927年，在13歲前都居住在臺灣，其後於1940赴日留學，1927至1940年間，日本對臺灣的統治已逐漸穩定，臺灣人和日本人的關係雖不如1915年前緊繃，但日、臺人不論在教育制度、社會地位和生活習慣上都有著不小的區別，也影響了日本政府治理臺灣的方針和具體政策。

本章的重點將放在林洋港所實際生長的時代環境下，包含林洋港童年時期生長的臺灣、求學時的日本、以及返鄉後臺灣的光復等時期，除了客觀的了解林洋港是在什麼樣的時代氛圍、制度下生長，以及林洋港人生的詳細歷程外，更重要的是林洋港實際接收到了什麼樣的資訊，而林洋港又是如何對這些訊息做出取捨，使其作出各種抉擇。

一、日本治臺方針

⁴ 由一八九五年臺灣民主國保衛戰開始，臺灣每有零星的武裝抗日行動；最後一波抗日行動，則始於一九零七年的北埔事件，一直到一九一五年的西來庵事件止，期間並有許多未發動就遭取締的抗爭事件。

（一）無方針主義、漸進政策與內地延長主義

日本治理臺灣之初，發佈六三法，授權臺灣總督可直接頒布具有法律效力之命令，使臺灣總督握有大權，在統治臺灣的過程中佔有極大之地位。此時日方以放任主義為政策，主張尊重臺人之風俗習慣並以漸進的方式對臺人進行同化，在 1898 年，兒玉源太郎出任第四任臺灣總督後，實行更務實的政策，包括實行保甲連坐制度及語言同化政策，並攏絡臺灣仕紳精英階級⁵，讓日本更有效的治理臺灣。

1918 年，新任臺灣總督明石元二郎宣佈以「同化主義」為主要施政方針，同時世界民族運動興起，各地殖民地都受到挑戰，1919 年臺灣總督田健治郎以「內地延長主義」為施政方針，一改過去將臺灣視為殖民地的治理心態，強調臺灣為日本領土，希望以教育和提升臺人地位的方式，使臺灣人能夠在文化和自我認同上成為真正的日本人，除了設置臺灣總督府評議會、改革地方制度外，也開放臺、日人共學和通婚，雖然日本總督府有明訂開放符合資格且熟悉臺灣民情的臺灣人可出任地方理事官⁶，但真正能成為高等官吏的臺籍人士卻寥寥可數。⁷到 1936 年小林躋造成為總督前，總督府都維持著內地延長主義與同化主義之方針。

（二）皇民化政策

1930 年代開始，為了使臺灣成為日本帝國主義擴張的南進基地，總督府更積極於臺人的同化，除了嚴格取締各種政治和社會運動外，大力推廣日語普及，期望能加速臺人同化之速度，使臺灣人能成為「真正的日本人」。1936 年，日本為了日後的南侵政策，期望使臺灣成為各項資源和兵源補給的重要基地，臺灣總督小林躋造開始推動皇民化、南進基地化、工業化等三大政策方針⁸，1937 年，中日

⁵ 傳統中國，縣級以下單位以仕紳階級為自治中心，在配合公權力的情況下更能有效的運用各種資源，固有不少仕紳階級被日本政府拉攏，財富和家世背景較高者即為總督府主要的拉攏對象。

⁶ 通過考試獲取資格的行政官吏，相當於薦任的高級文官。

⁷ 擔任過郡守(地方首長)者僅有李讚生、劉萬、林旭屏、林益謙、楊基銓、莊維潘六人

⁸ 小林躋造治台三大方針：一、推行「皇民化政策」，為使臺人成為「皇國民」，在文化語言上實行各種措施，推動常用日語運動，獎勵「國語家庭」、「國語模範部落」，鼓勵臺人改為日姓等，並成立「台灣青年團」、「文學奉公隊」等組織以推動支援戰爭。二、臺灣工業化政策，開發電源、擴充國策公司、統制米、糖等物資之購買。三、南進基地化，設華南調查局及南方協會，並著手修建臺灣西岸新高港及各地機場等戰時體制。

戰爭全面爆發，日本政府更致力於臺灣的皇民化運動，以獎勵使用國語（日語）、獎勵改用日本姓名、供奉日本神祇等方式進行，文學和戲劇也都成爲推行皇民化政策的手段。1938年，爲了更有效的動員人力、物力資源，日本政府發布「國家總動員法」，所有日本領土均進入戰時體制，1942年，開始招募臺灣志願兵，1945年正式實施徵兵制，總計臺灣籍士兵共超過二十萬名，但仍無力回天，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臺灣正式結束長達51年的日本殖民時期。

二、 教育制度與內容

（一）日語普及政策

日本在臺灣的教育本因應著「無方針主義進行」，對臺灣實行的教育僅以解決語言不同問題爲主，也因此日本的國語普及政策，一直是日本在臺推行教育的核心之一，爲了打破語言的隔閡，臺灣總督府在1896年就設置了「國語傳習所」⁹以及讓日人學習臺灣語言的「臺灣語講習會」、「土語講習所」等機關¹⁰。1898年，臺灣公學校令發布，設立六年制公學校取代國語傳習所，除了日語外也教導修身、算術、唱歌的科目，但日語外的科目只佔教學時數的三成，是爲強化日語學習爲目的之科目。

1915年開始，總督府鼓勵各地領導階層組織國語普及會，展開國語普及運動，各種日語推廣設施不斷成立，但日語普及之成效仍不如預期，1930年，臺南州懂日語的人數更只有8%，確切落實國語普及成爲總督府的重要目標，1933年制定「國語普及十箇年計畫」，期望在十年內提升臺人懂日語的比率至50%以上，除了有計畫地在各市、街、庄、部落廣設國語講習所外，也規定官方團體限用日語及雇用人員時以日語爲條件之一、在各公家機關、團體使用日文、發行多種日文刊物和音樂，並建立國語家庭、國語部落，希望徹底地讓臺人將日語使用至日常生活當中，到了1940年，懂日語的臺灣人已到達總數的51%。

⁹ 國語傳習所分爲甲、乙兩科，甲科以年輕仕紳爲招募入學的對象，施以短期日語教育後，任用爲基層的吏員或教師，乙科則招收8至15歲學童，修業4年，但乙科無公費和就業保障。

¹⁰ 台灣教育會編，《台灣教育沿革誌》，（台北：南天書局，1995），頁165。

總督府推廣日語的重要目標之一是爲了同化臺人，認爲日語本身含有日本國民的精神與性格，只要熟習且常用日語就可擁有日本人的民族性，但日語卻未深入臺灣人的日常生活當中，臺人在日常生活中仍多使用臺語，多數懂日語的臺灣人，對日語也僅是粗淺的認識，且只有在公共場合才使用日語，惟日語雖未深入臺人日常生活，但已確實地成爲臺人接收知識的主要工具¹¹。

（二）教育制度的改變

福澤諭吉的脫亞論¹²中認爲甲午戰爭是「策畫文明開化之國家與妨礙文化進步之國家的戰爭」，可見日本瞧不起中華文化的心態，在對臺灣人的教育制度中此種情形也清晰可見，臺灣人和在臺日人擁有的教育資源和機會都相差甚遠。起初臺灣總督府對臺灣教育並沒有確切的方針和完整的制度規劃，臺、日人間有著明顯的差別待遇和隔離政策。

日本殖民初期臺灣公學校也以仕紳階級爲主要招募入學對象，以六年制公學校爲主，民間書房爲輔，中等教育以上設施不全，到了 1915 年，才在林獻堂爲首的地方仕紳捐款捐地下，設立了公立台中中學校¹³，此時的公學校入學率只有 9.6%。1919 年，根據差別原則，總督府發布「臺灣教育令」，明訂了關於臺灣人的教育制度，設置了高等普通學校、女子高等普通學校、師範、商業、工業、農林學校等，但不僅數量不多，在教育的內容和修業年限都低於日本的同級學校。

1922 年，新臺灣教育令發布，明定中等以上教育機關（除師範學校外）取消日、臺人的隔離教育，開放共學，以初等技術人才爲主要培育對象，在臺灣各地成立不少中學校、女子學校、職業學校，此後並不斷增設各種職業補習學校，到 1944 年已有九十所。但在初等教育上仍維持小學校、公學校以及番人公學校的三軌教育，並且雖然在制度上以開放共學，但實質上卻是提供了在臺日人更多的教

¹¹ 吳文星，1992，頁 365。

¹² 福澤諭吉發表於日刊新聞《時事新報》頭版上的社論，認爲鄰近的亞洲國家拒絕現代化，日本須與西方同步擺脫落後的亞洲，並以「與惡友親近者難免身背惡名。我們必須下決心與亞洲東方的惡友決裂」作結。

¹³ 1922 年改爲臺中州立臺中第一中學校，現台中一中。

育機會，臺人進入高等教育機關的人數反而減少。1937年，為配合「皇民化政策」，廢除了公學校漢文科，1943年，6年制義務教育實施，學齡兒童就學率在1945年已超過80%，¹⁴但因平等共學的政策從未確切落實，在高等教育方面臺人始終未獲平等之機會。

（三）留學教育

由於在日本殖民時期臺灣的教育欠缺完整的制度和公平的機會，在臺灣的高等教育機構幾乎為在臺日人子弟而設，在高等教育的需求無法獲得滿足下，不少臺灣人選擇海外留學之路，留學的目的地以中國、日本、歐美為主，但總督府對於回中國留學有不少限制，歐美比起日本，地緣和語言的因素較為不利，日本遂成為當時臺人主要的留學考量。1895年開始就有臺人赴日留學，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留學生人數更是急遽增加，到了1942年度，赴日的留學生多達7091人。

1918年前，留日學生以初、中等教育為主，其後留學高等教育之比例不斷攀升，1934年後已超過留學人數的一半，可見此時臺人在臺灣無法獲得高等教育的滿足下，轉而以留學的方式尋求高等教育之機會。¹⁵但留學之經費所費不貲，因此能留學海外者多以中上階層為主，以修習醫科、法律、商業為主要目標。留學教育培養出的高等人才人數，大幅超越臺灣高等教育機關，除了代表日本政府在臺灣所提供的高等教育在內容和數量上的不完備外，也顯現了在臺灣菁英人才得不到公平教育機會的其他選擇。

不少日本殖民時期的留日學生，在臺灣光復前後起了領導的作用，例如留日學生林忠、李友邦、丘念臺、連震東等人被國民黨邀請參與臺灣調查委員會的工作，又有組織保護社會秩序的治安團體與救助島外臺胞的行動，李躍乾認為留日學生能夠組織團體、辦理報紙並參加國民政府接收臺灣的計畫，主要原因是留日

¹⁴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臺灣史》，（臺北市：五南，2011），頁211-212。

¹⁵ 吳文星，1992，頁119。

學生是有著經濟、文化、社會關係資本的一個社會階層，¹⁶而面對光復初期臺灣的各種亂象，留日學生也積極進行各種輿論¹⁷、請願的批判和抗爭行動，在二二八事件中，留日學生同時是被鎮壓以及安撫的對象，留日學生在臺灣各地的處理委員會中佔有領導地位，二二八事件時，陳儀提交給蔣中正的主犯名單中，留日學生高達一半，¹⁸同時也有不少留日學生參與安撫的工作，部分留日學生接受了國民黨的安撫，部分則對政治感到失望、消極，並有部分人走向了臺獨的道路。

貳、1940年代的日本

一、統制經濟與戰爭

1938年，由於和中國戰爭的全面爆發，日本制定「國家總動員法」，以此動員國家所有的人力與物力，並進行統制經濟，與國內財閥合作，以軍需用品為最優先生產，鋼鐵、棉、絲織品和橡膠等民生必需品也都被限制製造和販賣，不斷進口汽油、鋼鐵等軍需物資以及汽車、化學工業、軍事、飛機部門的開發，全力投入軍需用品的生產。同時國家預算大幅增加，國內物價上漲，與軍需無關的中小企業都大受打擊，勞工工資減低、日幣貶值、農村飢荒，使得日本國內一般民眾生活日益艱辛。

1939年開始，各種糧食、砂糖、火柴、白米、木炭、衣物相繼成為統制經濟的管制對象，必須以配給的方式才可取得，並徵招日本國民進軍工廠工作，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同時要面對陷入泥沼的中國戰場和擁有強大經濟實力的美國，在物資上已難以自足，同時美國對日本實施石油禁運，對國內生產只有需求的十分之一的日本無疑是重大打擊。1942年，日本已喪失制海權，美國轟炸日本本島，1945年，美英蘇三國發表「波茲坦宣言」，勸日本無

¹⁶ 李躍乾，《日據時期臺灣留日學生與戰後臺灣政治》，（北京：九州，2011），頁64。以黃朝琴、林茂生、杜聰明、等人物為例分析留日學生階級的特性。

¹⁷ 例如林茂生辦理的《民報》對當局有十分嚴厲的批判。

¹⁸ 李躍乾，2011，頁100。

條件投降，遭到日本拒絕，同年美國於廣島、長崎分別投下原子彈造成日本重大傷亡，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

二、社會環境與教育

戰時的日本，在全球不景氣的影響下，基層民眾生活困苦，工廠接連倒閉使失業人數不斷攀升，日本政府束手無策，雖有不少救濟福利制度，但都無法解決當時的困境，政府為軍人掌控，推行軍國主義，將天皇神格化，所有言論出版自由和社會運動都被限制扼殺，人民被灌輸愛國思想，背誦天皇敕語，以利戰時體制的運作。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就積極模仿西方學制，1877年開始相繼於東京、京都、東北、九州設立帝國大學，1890年公布「教育敕語」¹⁹為日本教學的理念，加強了國家對教育的統制，1886年，已有四年制的義務教育，1907年延長為六年，且初等教育的入學率達到90%，而高等教育的升學率雖然連年增加，1935年中學和高等教育的入學率也只有18%和3%，²⁰可見日本國內的高等教育仍是菁英教育，並且因為戰時體制，在思想和言論出版方面都受到嚴格的控管。

參、光復後的臺灣

一、光復後的社會環境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中華國民政府以陳儀為臺灣省行政長官，負責接收臺灣，在臺北設立行政長官公署，進行對臺灣的接收管理事宜，但在經濟上設置專賣局及貿易局統治物資，收接過程貪污舞弊、兼且通貨膨脹、物價高漲，都使臺灣人心生厭惡、不滿，在文化教育上則對所有與日本有關之書籍、報刊進行管制銷毀，改變日式地名、習俗、以及拆毀日式建物，將

¹⁹ 內容為日本神道和傳統儒家的忠君愛國的封建思想，以德育為名義，宣揚敬奉天皇、愛國主義的道德教育。

²⁰ 林明德，2006，頁258。

日本殖民時期的日本化轉向為中國化。1946年省參議員選舉，應選三十人，卻有多達一千一百八十人參選，可見臺人對於臺灣光復後，自由、參與政治的熱情與期望，但不料在中華民國政府對臺灣的陌生和各項政策處理失當下，爆發了二二八事件，使臺灣人的期望轉為失望甚至是痛恨，對外省人的不滿一下升到最高。

陳儀政府對於臺灣人過於忽視，長官公署的重要正副處長多由外省人士擔任，但這些外省公務員、軍人不少都以拯救者的身分自居，常有貪贓枉法的醜聞傳出，卻認為臺灣人應該以感激的態度來面對，將臺人視為被日本洗腦的被統治者甚至是日本為惡的爪牙，都再而三的挑戰臺灣人的自尊²¹。

1947年，2月27日，查緝私菸的警員對空鳴槍卻誤殺一般民眾，引起民眾激憤，翌日臺北工人、學生、商人以罷工罷課的方式表達抗議，數百名群眾前往長官公署抗議，被士兵開槍射擊，三人死亡，更是火上澆油，群眾佔領臺灣廣播電台，向全省廣播，批判官吏，呼籲驅逐各地官吏，使得事件擴大延燒至臺灣全島。不少外省籍人士遭臺灣人毆打重傷，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甚至獲取情報，指為共產黨主導的暴動事件3月5日，派兵來臺鎮壓，結果發生大規模的屠殺報復行為，公署宣布戒嚴，期間密函陷害、告密、恐嚇的事件不斷發生，導致不少菁英份子離開政治，甚至出走海外鼓吹臺灣獨立。²²

二、中華民國在臺灣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在中國大陸戰況不利，在臺灣發布戒嚴令，禁止集會、遊行、請願、罷工、罷課等行為，嚴格防範中共間諜，不少人因為通匪罪名而被逮捕，其中不少冤案，同年12月7日，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臺，正式開始了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時期。由於仍在戰亂時期且剛發生二二八事件，在戒嚴令下，各種人身自由如出版、言論、結社的自由都被限制，1950至1970年代，各種爭取自由、政治參與、改革司法的刊物如《自由中國》、《公論報》、《臺灣政論》、《美麗島》等，都相繼出版以及被政府單位查禁取締，但希望解除戒嚴的聲音仍不斷

²¹ 荆子馨，2007，頁62。

²²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2011，頁254—256。

出現，直到 1987 年，政府宣布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以及其餘所有有關戒嚴的法令都被廢除、修訂。

至此，國民黨的黨國體系也逐漸瓦解，邁向民主競爭之途，原先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國民黨以黨領政下，是一威權體制，兩蔣父子先後為領導者，積極建設臺灣以期待未來能反攻大陸，雖從 1950 年開始即有縣市長的選舉，但都在國民黨的掌控之下，省主席為官派，國民大會代表更是不斷延任，政權由國民黨一手把持，要分享資源也就必須進入國民黨的體系之中，在兩蔣父子相繼去世後，國民黨缺乏精神領袖能整合，產生分裂，黨外勢力也逐漸茁壯，臺灣的政治環境邁向多元。

第二節 成長經歷與抉擇

壹、成長過程與背景

一、童年的成長

林洋港出生於 1927 年的臺中州新高郡魚池庄頭社村²³，家族以務農為生，林洋港生父林生傳為家中三子，林洋港出生時，大伯父林啓昌仍未有子嗣，祖母認為家族長房無後是極為嚴重之事，故在長輩的授意下，林洋港被過繼給大伯父當養子，由於家族同住在一間三合院中，且一直到 12 歲時才完成過繼手續，林洋港回憶兒時並未對於有擁有兩名父親²⁴有特別感覺。養父林啓昌除了務農外也會算命與看風水，雖然並非嚴謹的學術研究，但對中國傳統的論語、孟子也有涉略，林洋港身為家中長男，備受期待，從小就有接觸三字經、論語、孟子等中國典籍，並且有上公學校就讀的機會，因而背負著家庭的期望。

林洋港 7 歲時進入頭社公學校就讀，當時的公學校教育以日語為主，其他另有算術、修身、唱歌等科目，林洋港回憶其在校成績十分優異，師長們都為臺籍

²³ 今南投縣魚池鄉頭社村。

²⁴ 林洋港以阿爸とお父さん為生父和養父的不同叫法，其弟也以兄さん稱呼林洋港。

人士，對林洋港十分愛護，由於公學校學費頗高，若遇有由於家中一時拮据，未能如期繳交學費時，林洋港回憶老師和校長會先為代墊，等林洋港家中有餘財時再行歸還²⁵，師長的恩惠讓林洋港立志未來能從事教職，到林洋港就任省主席時，都還能列出師長們的名單，²⁶可見林洋港對施恩的感念。林洋港 13 歲時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頭社公學校，養父也一直十分支持林洋港繼續升學，故林洋港報考了臺中一中，結果卻不幸名落孫山。林洋港本欲回頭社公學校再讀一年，隔年重考臺中一中，此時養父友人欲送兒女赴日留學，養父母總說即使賣田賣地也會讓林洋港受高等教育²⁷，林洋港也在養父的建議下，開始赴日留學的生活。²⁸

二、赴日留學

（一）求學過程

林洋港到達日本時，日本的學期已經開始，故先就讀位於東京的正修預備學校，準備隔年的插班考試，十個月後林洋港報考昌平中學三年級，順利地通過考試。這所學校白天為正修預備學校，晚上為昌平中學²⁹，師資有一半相同，林洋港在回憶中對當時 79 歲的校長橋健三（1861—1944）印象特別深刻，橋健三是漢學的研究者，十分推崇儒家文化，授課以四書為主，在臺灣只能於家中學習的中國典籍，反倒是在日本有深入學習的機會，林洋港從小對四書五經的接觸，也沒有因為到日本求學而中斷。在昌平中學畢業後，長輩希望林洋港能繼續深造，林洋港便報考了第一高等學校和私立大東文化學院，但都相繼落榜，此時日本已進入戰時體制，食物配給不足，生活頗為困難，日本政府封鎖了戰時資訊，在不知回程路途危險的消息下，林洋港決定返臺，也很幸運地在 1944 年 10 月安全回到臺灣。

²⁵ 林洋港，1992，頁 154。

²⁶ 廖慶洲，1988，頁 40。

²⁷ 官麗嘉，1995，頁 355。

²⁸ 林洋港自認家境清寒，但以其能赴日就讀以及回憶錄中提到學費加生活費有 40 円來看，應屬小康階級。

²⁹ 原開成夜學校，1936 年更名為昌平中學。

（二）日本生活

林洋港起初對於赴日留學的決定並沒有實感，只是單純在長輩建議下的決定，養父也不斷告誡林洋港要專心讀書，家中即使賣田賣地也會讓他把書讀完，讓林洋港沒有後顧之憂，可以專心在學業之上，林洋港回憶在日本的幾年間也都一直保持著第一名的成績，雖然沒有餘財到處玩樂，但比起其他需要半工半讀的同學們，仍可說是十分幸運。這數年間林洋港都在東京而未返回臺灣，對日本人的禮儀、守紀、整潔、治安都有深刻印象，但對日本人喝醉後的放浪形骸則十分不以為然。

（三）赴日之感受

對於林洋港而言，赴日並未讓其同化為日本人，反而更強化了對於中華文化的認識，由於從小接觸的中國文化，使其有著身為中國人的自覺，赴日留學時，對四書的研讀，使林洋港對中華文化的接觸得以延續，在林洋港的回憶中，校長橋健三除了是儒家文化的推崇者，也批判日本的侵華戰略，講述在偽滿洲國日本軍人囂張跋扈的情景，同時林洋港赴日時，日本進入戰時體制，不僅糧食配給不足，也常耳聞憲兵和高級警察捉拿反對戰爭的思想犯之情事，對年輕的林洋港而言，日本在個人操守和文化上有值得學習之處，但更多的是軍國主義的惡行惡狀。

三、光復返台

（一）返鄉任教

1944年10月林洋港返回臺灣，此時頭社公學校老師多被徵招入伍，林洋港以中學畢業生身分至頭社公學校代課，同時因為戰爭關係，此時臺灣實行徵兵制，養父母擔心林洋港不知何時會被徵招入伍，希望林洋港能結婚以傳宗接代，林洋港雖無成婚念頭，但也在養父母的遊說下，17歲半的林洋港在1944年12月和陳合女士完婚。隔年林洋港便被徵招入伍，由於林洋港未足齡，故被編派到竹南國小的營區擔任警備員，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林洋港回頭社公學校繼續任教。

（二）臺大求學

臺灣光復後，林洋港開始學習國語，並希望能更繼續升學，在家人的支持下，林洋港在 1946 年通過臺大先修班入學考試，進入臺大就讀，也因為日本殖民時期，對臺人教育上有諸多限制，臺灣光復後，林洋港決定就讀當初被嚴格限制的政治學系³⁰，希望未來能進入政府單位服務。當時多數學生家境並不優渥，都領取以糧食配給方式的獎學金，生活上勉強可以自足，但林洋港在農忙時候仍必須回鄉務農，幸好有同學蔡經在課業上的協助，使其仍能趕上課業進度。林洋港對大學生活印象最深刻的並非各個學科內容，而是關於民主國家、法律和何謂政治家等等的概念，以及各種的專題演講，如陳啓天講授的韓非子，戴炎輝對民法和唐律的獨到見解，特別是薩孟武教授講述上位者不可剛愎自用的自我要求，也是林洋港不斷強調的理念。

（三）二二八事件

林洋港剛進入臺大不久，在 1947 年發生了二二八事件，林洋港雖不清楚事件整體情況，但也目睹了軍警射擊或和拘捕百姓的場景，不少外省籍同學和教授都選擇返回大陸，情勢十分緊張，林洋港的故鄉頭社村因沒有武裝抵抗，且駐地軍官軍紀良好，並沒有衝突發生。林洋港認為二二八事件的起源並非省籍問題，日本殖民時期臺灣人雖受到許多不平等的待遇，但同時卻也建立了良好的法治觀念，日本投降後，人民對國民政府來臺充滿期望，因此不少人特別去迎接來臺的國軍，看到的卻是裝備簡陋、軍紀渙散的軍隊，人民雖可以體諒抗戰的辛勞，但來臺接收的政府人員，不僅以拯救者的心態面對臺灣百姓，並且有不少貪汙的消息傳出，民眾對此已有不滿，而警察在查緝菸販時開槍就成為了事件的引爆點，因此林洋港認為，政府人員缺乏法治觀念才是二二八事件的主因。

³⁰ 此為林洋港之印象，但與實際情形不符，法政學系為日據時期熱門科系。

貳、政治生涯

一、步入公職

1951年，林洋港臺大畢業，薩孟武教授和戴炎輝教授都有意留林洋港為助教，但此時林洋港已有兩名女兒，在經濟上頗有壓力，若在臺北工作，不僅要負擔額外的食宿費，也無法照顧家庭，因此林洋港考取了公務人員資格，到臺南擔任三個月的臨時稅務員後，就調回南投縣政府工作，雖然薪水並沒有比較高，但卻可以就近照顧家庭。林洋港在南投縣政府擔任行政課員，擔任收發公文的工作，1953年，林洋港加入國民黨，適逢行政課長出缺，林洋港為通過高等考試的大學畢業生，便被拔擢為行政課長。行政課長的工作是在第一線和民眾接觸，例如參加里民大會、地方事務、了解地方基礎建設等，林洋港在行政課長的職位上待了9年之久，南投縣235個村里林洋港只有15個村里沒去過，讓他對地方事務、民眾都非常了解，打下了非常良好的地方基礎。

1962年，林洋港升任南投縣政府秘書兼新聞發言人，兩年後南投縣長洪樵榕任滿，林洋港為了表現自我的企圖心，遂前往登記黨內初選，與南投縣議會議長楊昭壁競爭，最後由楊昭壁獲勝，林洋港此時有接任民政局長或省政府秘書的選擇，林洋港認為自己在南投縣政府已13年，就決定接任省政府秘書尋求新的挑戰及學習的機會。1966年，南投縣長楊昭壁因病過世，林洋港被國民黨提名為南投縣長參選人，林洋港在南投服務十多年，已打下深厚的基層實力，在此次縣長補選中花費不多就順利當選，一年四個月後參加縣長連任之選舉，也順利連任，在這兩任縣長期間，林洋港多以地方基礎建設發展觀光為主要施政。此外林洋港同時兼任南投縣救國團主委和縣黨部主委，也常發生多重立場的矛盾，故林洋港請求兼免黨職，以避免身分矛盾的尷尬。

二、仕途的開展

（一）省政府建設廳

林洋港任職南投縣長的 5 年半間，臺灣省省主席分別為黃杰、陳大慶，林洋港回憶和兩位省主席都相處融洽，兩位省主席也都很支持南投縣政府的縣務，在諸多長官、同僚中，謝東閔是林洋港不斷提及感念的長輩之一，林洋港任南投縣長時，謝東閔為省議會議長，其後為省主席。1972 年，林洋港縣長任期屆滿後，謝東閔認為林洋港開發南投三合新社區、南崗工業區和中興新村的農地重劃都頗有成績，故提議由林洋港擔任省政府建設廳廳長，林洋港只曾在送交縣府都市計畫時和省政府建設廳有所接觸，細節部分都不甚明瞭，但林洋港認為全力以赴應該可面對這新的挑戰，縣長卸任後能到省政府工作也是不錯的發展，故欣然接受。

（二）臺北市長

1976 年，林洋港離開省政府建設廳長職務，調任臺北市長，林洋港在臺北市長任內完成了不少建設和解決了不少問題，如榮星花園的經營問題、建國南北路高架橋和翡翠水庫的興建、開發信義計畫區還有仁愛醫院、陽明醫院、和平醫院等市立醫院的重建和拆遷。但同時也招來許多批評之聲，如興建建國南北路高架橋時，龐大的經費和煩瑣的徵收土地過程被批評為好大喜功，提案建設翡翠水庫時，更被批評為臺奸。1978 年，蔣經國和謝東閔成為中國民國第七任總統與副總統，省主席職位出缺，蔣經國指派林洋港接任省政府主席，林洋港自認還有不少想法未及實施，但也認為長官的開口不好推辭，在蔣經國的勸說下，接任省主席一職。

（三）省主席

林洋港在省主席任內時，由於之前已於省政府任職過，所以對於任內事務並不陌生，除了推動大型建設外，也積極進行地方基礎建設，這數年間是林洋港聲勢最高的時刻，1979 年的國民黨四中全會票選中常委時，林洋港得票高居第四，但也因此招來不少批評聲浪，除了訪日行程被認為過於高調外，林洋港也和行政院長孫運璿有了些摩擦，首先是經濟部為了德基水庫的水土保持問題，有意砍伐

當地果樹，而當地果農集體至中興新村請願，林洋港認為，若是直接砍伐果樹，不僅對當地果農財產造成損害，且要再等數年樹苗才會成長，這段期間的水土保持成爲空窗更爲危險，因此指示在果樹間種植樹苗，於果樹無法結果後再行砍伐。其次是關於二重疏洪道的事件，孫運璿認爲，爲了避免洪水氾濫的危險，二重疏洪道必須馬上開工，但林洋港認爲，二重疏洪道上的數萬名民眾仍未安置，一旦開工這些人將無家可歸，所以希望在安置妥當後再行開工，在兩人對此事意見不合的情況下，林洋港向蔣經國提出調職的要求。

二、進入中央

（一）內政部長

1981年，林洋港就任內政部長，當時黨外已有不少解除戒嚴的聲浪，由於黨禁是歸內政部管轄，一有關於黨禁的質詢，林洋港就必須做出答覆，林洋港回憶本身雖然贊成解嚴，且不少友人也都提醒林洋港戒嚴對臺灣的弊害，但身爲政務官員，代表政府，在蔣經國總統未宣布方針和政策前，就必須以政府官員的身分去作出回應，因此林洋港和黨外的關係逐漸緊張，自己也感受到不小的衝突和矛盾，可說是林洋港公職生涯中最爲苦悶的時刻，因此在1984年，內閣即將改組的同時，林洋港向當時內定的行政院院長—俞國華提出希望調職或退休之意，俞國華在和蔣經國商量後決定將林洋港調任行政院副院長。

（二）行政院副院長到司法院長

林洋港接任行政院副院長後，未如過去繁忙，與過去常在螢光幕前出現相比，坊間都認爲林洋港已被冷凍，但在較爲空閒的生活中，林洋港反而有時間重新開始閱讀四書和自我沉澱，並且開始撰寫日記。1987年，黃少谷請辭司法院長一職，蔣經國任命林洋港爲司法院長，林洋港並非法律背景出身，對此決定也感奇怪，但司法院院長爲主管司法行政工作，並非專業的法律裁判，也因此林洋港自認爲仍可勝任。在內政部長到司法院長這段期間，林洋港的工作多爲制定法律和重要政策爲主，相較前期的公職生涯，較無具體明確的建樹。

（三）國民黨的分裂

1988年，蔣經國去世，李登輝由副總統接任總統，國民黨內對於黨主席人選以及接任時間有不同之意見，林洋港認為當時並沒有人反對或是想和李登輝競爭黨主席，而是在蔣經國剛去世的時間點，黨內有人認為可以過一陣子再決定，最後李登輝也順利接任黨主席。1980年，國民大會將選出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與副總統，駐巴拉圭大使王昇告知林洋港希望改變鼓掌之方式，推動以投票方式決定總統副總統提名人選，林洋港同意改變選舉方式，同年國民黨臨時中全會，林洋港提出臨時動議，希望與會人士決定選舉方式，但主席邱創煥並未受理，仍以起立鼓掌的方式決定國民黨提名總統候選人為李登輝。

經過這些黨內鬥爭事件，國民黨內裂痕公開化，國民大會醞釀推舉蔣緯國和林洋港參選總統與副總統，林洋港雖認為不妥，但推舉人選為國民大會聯署，自認無法決定，其後不少友人、黨內同志都來勸說林洋港退選，但林洋港自認根本並未參選，又如何能宣布退選？最後在蔡鴻文、李登輝、謝東閔、黃少谷及國民黨內的長官、大老的聯合勸說下，林洋港發表不會參選的聲明，國民黨內政權在此時才暫時穩定下來。林洋港在內政部和司法院期間不僅因為職務關係，缺少了曝光度，又在經過這次事件後，得罪了想推舉蔣緯國競選的外省籍國大代表，也因為有和李登輝競爭的情況，不少臺籍人士認為他勾結外省人，被視為臺奸，重挫了林洋港的聲望。

（四）競選總統

1992年，林洋港為司法院長，在赴美訪問的兩個星期間，與當地華僑有不少座談會，會中有人質疑李登輝的臺獨傾向以及郝柏村的軍人身分，林洋港都為其辯護，不料回臺之後，卻遭李登輝責難為郝柏村說話一事，林洋港做事風格較為敦厚，決定事情時也以黨內團結為依歸，李登輝較為直接的行事風格，為林洋港決定參選總統的決定埋下遠因。1993年，總統李登輝和行政院長郝柏村不合，國民黨內意見分歧，對重視團結的林洋港而言實在難以接受，又傳出李登輝有意自行組黨的風聲，黨內鬥爭的風風雨雨強化了林洋港競選總統的念頭，同年8月17日，國民黨十四全大會中，原本預定由郝柏村出任國民黨副主席，但在李登輝授

意下出現了反對聲浪，最後雖然郝柏村仍當上了國民黨副主席，但這次的事件讓林洋港下定決心，決意參與 1996 年總統大選，1994 年，林洋港宣布辭去司法院長並將參選第九屆中華民國總統選舉，最後在 1996 年的總統選舉中，林洋港和郝柏村的總統副總統組合，以無黨籍身分獲得 14.9% 選票，在總統大選中落選，其後林洋港退出政壇，搬往臺中，以明德安和文教基進會和中華臺海兩岸和平發展策進會董事長身分，進行兩岸交流活動。

第三節 價值觀的構成

壹、環境的影響

一、家庭環境

林洋港出生在農村家庭，家中以務農為生，經濟並不富裕，從小就要幫忙農事，上下學也需赤腳步行 40 分鐘左右，養成了林洋港較能吃苦耐勞的忍耐力。雖然因為家中長輩識字，從小也耳濡目染，但能受正式且完整的教育之機會實則不高，兩名姐姐都無法就讀公學校，讓林洋港對於讀書這件事十分看重與珍惜。從小生活在大家族之中，生為長男，家族對於其寄予厚望背負著不小的責任，對林洋港的生活教育十分嚴格，諸如早晚必先向長輩請安、長輩動筷後，自己方可用餐等等，在林洋港幼時就已經種下根深柢固的長幼尊卑概念。加上從小閱讀的三字經、論語等儒家典籍，莫不是強調禮法之重要，因此林洋港對於自我的立場定位十分看重，在提及長輩時，都使用尊稱，對長輩的應對進退也都以謙讓為主，不少的演講內容中都不斷強調中國傳統的人際關係如家庭關係、自我修養以及禮儀的重要。林洋港由日本學成歸國後，旋即就業、完婚，18 歲的林洋港已成家立業挑起家中經濟的擔子，就讀大學期間也必須時常惦記家中況，大學畢業時已有兩名女兒，都可能影響了林洋港較為保守內斂、追求團結、務實的性格。

二、學校教育

在頭社公學校就讀時，學校教育雖以日語為主，但學校老師多為臺籍人士，且整個民間社會仍以使用臺語為主，日語並未進入臺人日常生活之中，於頭社公學校畢業後，未考上臺中一中而到日本留學，林洋港回憶在日本留學期間，校長橋健三除了宣揚的道德內容外，也批判日本侵華的策略，在課堂上描述日本扶植滿洲國後，在滿洲國境內日本人的囂張跋扈，同時爲了因應戰時體制，日本本島也實施糧食配給制度，於日本生活十分困難，林洋港雖然有赴日留學，但卻未曾產生對日本的憧憬，換言之，林洋港在日本殖民體制下所受的教育，反而強化了林洋港對於中國文化的了解與想像，在日後的從政生涯中，也十分常見林洋港以論語、菜根譚或其他漢學內容爲例，解釋行事原則和自我修身的道理。

三、從政環境

林洋港從政前發生二二八事件，但林洋港家鄉的南投縣並未受太大影響，林洋港本身及其家庭也未成爲事件的受害者，林洋港認爲二二八事件中，政府是可以更妥善的處理，但並未歸類省籍情結爲衝突原因，而是認爲法治觀念的不同才是重要因素，認爲建立法治觀念方爲重點，而未對國民黨政府產生怨恨心理，並不影響林洋港進入政府體制，林洋港在大學畢業後進入政府機關任職，由於林洋港是以高學歷的身分進入，又是在熟悉的故鄉任職，加入國民黨後很快的升任行政課長。林洋港 40 歲前都在地方基層服務，其較爲草根的性格，和當地官員和民眾都相處融洽，讓林洋港對於從事公職的選擇十分滿意。

林洋港 40 歲成爲南投縣縣長，成爲體制內的菁英分子，在林洋港印象中蔣介石與蔣經國都有積極建設臺灣的念頭，時常下鄉查探民情，而從政的友人們，如歐樹文、謝東閔、孫運璿等人，都是爲國家努力奮鬥的團結黨內同志，地方建設也都清白乾淨，基層民眾淳樸熱情，這些是在林洋港認知下的政治環境，或許爲選擇性，也或許其所接觸的剛好是爲正面積極的部分，林洋港對於爲公眾服務的公職生涯有著強烈的使命感，對於國民黨以及黨內同志也都有濃厚的感情，在林

洋港的認知中，這時的政治氛圍是在黨內同志有著共同目標，並且有確實的精神領袖的情況下，積極進行對臺灣的建設，身為政治精英一份子的林洋港，為體制內的受益者之一，加上所見的良好政治氛圍，使得林洋港不斷地為了黨內的團結努力以及退讓。

貳、行事風格

一、草根性格

林洋港為南投縣務農家庭成長，有著較為熱心、豪爽的草根性格，容易和民眾打成一片，對他人的好意即使不願意也大多不會拒絕，在擔任南投縣行政課長期間，林洋港參加村里民大會時，也要負責宣導各種政令措施，林洋港口才便捷，常引經據典以故事的形式表達，廣受村里民的歡迎，林洋港也不斷變換故事內容向居民灌輸各種道德價值，³¹當時識字率仍低，林洋港也無償幫地方居民代寫各種申請、陳情書，塑造林洋港熱心、樸實的農家子弟形象，下荒地修二³²曾將林洋港與鄧小平相提並論，並如此形容林洋港的個人魅力：「林洋港不論出現在那個場合，都會立即成為大眾注意的目標、談論的焦點人物。這是甚麼因素使然呢？我也答不上來。這是個很奇妙的不可解的自然現象。記得我以前在北京任職時，曾在許多場合見過鄧小平。他也是這樣的人物。個子雖小，卻好像渾身充滿熱力一樣，一出現就會令人目眩神搖。這種人，大家不禁都要多看他一眼，不管你是否喜歡他。」並將林洋港與不造假、明朗爽快的田中角榮相提³³。

林洋港能在地方基層打下基礎，另一個要點是和民眾以喝酒的方式「搏感情」，林洋港的好酒量與表面張力的飲酒方式十分聞名，林洋港認為酒能拉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即使是陌生人，一起喝酒後馬上就能熟絡起來，林洋港也歸納出一些對酒的看法：「滴酒不沾是俗人，能飲不醉是雅人，每飲必醉是愚人，每醉必鬧是狂人，強人飲酒是霸人。」明白的表現林洋港對於酒國文化的愛好與認

³¹ 廖慶州，1988，頁 31。

³² 日籍外交官，曾任日本交流協會台北辦事處總務主任。

³³ 雷聲周刊十三期。

知，林洋港回憶，南投過去有分為山腳和山頂的派別，在爭設國中時，雙方僵持不下，林洋港便提議以拈酒的方式，如果林洋港能贏，那麼就聽任縣府的裁決，最後林洋港也成功解決此事。³⁴林洋港也自有一套關於酒的文化和規矩，例如：敬酒、斟酒、離席的順序，並引經據典說，論語鄉黨篇有言：「鄉人飲酒，杖著出，斯出矣。」³⁵就是在講關於離席的禮儀，也可見林洋港對於禮儀和自我身分的重視。

二、不伎不求

林洋港在從政生涯中的一句名言就是不伎不求，不伎不求出於《詩經》：「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意思是不妒忌，不貪求，林洋港認為自己之職責所在為何，就盡力去完成，也和熟讀四書和菜根譚，其中包含不少修身養性的部分有關，對沒有太大野心和權力慾的農家子弟來說，完成分內之事是最重要的目標，而如果上級指派任務或是他人有正當理由的請託時，也不會去推辭避責，這在林洋港在國大代表醞釀推舉候選人時體現，他乃主張自己是候選而不競選，以及外傳有可能接任行政院長時，林洋港在回憶錄中表示：「如果總統考慮提名我，而我能為國家為同胞奉獻一點心力，我自然不能推拒；另一方面，我對任何職位也不敢存有非我莫屬，除了我就沒有人比我更好的過份武斷自負的心理。」³⁶林洋港公開表示，如果被提名或任命，就會盡力去做，但並不主動要求，在林洋港的政治生涯中，充份表現出不伎不求的態度。

三、追求團結

林洋港的政治生涯中一直扮演著促進團結的角色，以圓融的態度期盼解決紛爭事端，林洋港對國民黨和國家的深厚感情，林洋港 27 歲加入國民黨，所見所聞多為正面的事蹟，蔣中正與蔣經國兩位總統，對林洋港十分親切，黨內友人歐樹

³⁴ 官麗嘉，1995，頁 57。

³⁵ 廖慶洲，1988，頁 83。

³⁶ 官麗嘉，1995，頁 314。

文、孫運璿、謝東閔等人也都頗有清譽，在林洋港心目中的國民黨，即是在兩蔣的精神領導下，團結一致的政黨，但在兩蔣過世後，國民黨開始分裂產生事端，林洋港在兩邊周旋，想進行調停的情況下，反而落入裡外不是人的窘境。

林洋港追求團結的行為可由以下幾點看出端倪：

（一）、林洋港在 1990 年，一再表示自己是候選而非參選，這是對自我定位的表明，自己並沒有退選的立場，但在八大老的人情勸說以及爲了黨的和諧氣氛下，林洋港仍然發表了退選聲明，在此之前，林洋港找回分居各地的子女說道：「國民黨大會即將進行的總統選舉，我爲社會安定已經決定婉拒國代的支持，並將在適當時機發表聲明。」³⁷

（二）、林洋港擔任司法院長時出訪美國，即使早知道郝柏村和李登輝之間的裂痕，但在對面提問時，仍選擇了幫兩人都辯解澄清，而沒有選擇任何一方，導致李登輝的不滿。

（三）、李登輝的行事風格和做法讓林洋港心生不滿，但也仍然表示是否和解、團結的主導權都在李登輝身上，³⁸說明其願意和李登輝合作的心意。

都說明了林洋港爲了黨內的團結調停，放棄自身立場，或是去做吃力不討好的協調工作，但在兩蔣去世後，國民黨分裂，林洋港的團結訴求並沒有被黨內主事者所接受。

參、抉擇的環境與原因

一、赴日求學

林洋港爲臺籍農家子弟，當時民間物質生活並不富裕，林洋港在養父的有意栽培下，對於讀書上學的機會十分重視，除了幫忙農事外，林洋港就專注在求學

³⁷ 林明玲，1995，頁 34。

³⁸ 官麗嘉，1995，頁 286。

之上，林洋港回憶在頭社公學校的每個學期都獲得第一名，在學業上獲得充分的成就感，報考臺中一中落榜後，選擇了赴日留學。

首先在當時臺灣的社會中，臺籍子弟升學不易，赴日留學為當時的潮流，但也需要相當的經濟實力才可赴日，當時林洋港家中開了碾米廠，加上養母餵養雞鴨的副業，有足夠的經濟能力送林洋港赴日留學，而林洋港在家中的傳統教育下，對於長輩本就十分順從，一方面對於讀書有著濃厚的興趣，一方面在養父的勸說命令下，林洋港回憶其懵懂的選擇了留學一途，但實際上對缺乏資訊且從未獨自離開家族的農村子弟來說，林洋港對於留學並沒有實感，12 歲的林洋港在坐上開往日本的船上才想到此後要離開父母，獨立生活。林洋港日後回想，若非自己生為家中長子，又被過繼給大伯父當養子，在窮鄉僻壤的佃農家庭中，應該是沒有留學的可能性的，³⁹而在臺灣的教育機會較低，除非身為仕紳子弟或在學業上有非常傑出的表現，可能都沒有繼續就學深造的機會，林洋港之胞弟林仙鶴便留在頭社村務農，並參與當地農會活動。

二、返鄉歸國

林洋港雖無崇日情結，但願意遠赴日本讀書，並且仍希望在日本繼續深造，可見其對日本仍有認同之處，林洋港於昌平中學畢業後，報考第一高等學校和私立大東文化學院落榜，戰爭時期的是本物資也並不充足，從小聽父親對日本的抱怨、親眼見到日本警察的蠻橫⁴⁰、校長橋健三對於日本政府的批評，加上無法擠身日本的精英集團之中，讓林洋港決定返回臺灣，但對從小接受日本是侵略中國⁴¹、徵收臺灣人農作物的統治者此一印象的林洋港，即便在日本繼續深造，也不易改變其對於中國和日本的認知與認同。但日本的教育卻影響著林洋港對於儒家文化的理解以及其他新知的吸收，日本的四書教育以自我修養為主，林洋港在日本稱讚的也都是日本的人安分守己，負責有禮，長幼有序等，與林洋港幼時的家庭教育不謀而合，在林洋港的書櫃上也大多是日文書籍，包括四書、菜根譚、人物傳記、政治之書籍等等。

³⁹ 官麗嘉，1995，頁 18。

⁴⁰ 林洋港就讀公學校三、四年級時，村內日籍警察常隨便打罵臺灣人。

⁴¹ 林洋港生父林生傳常告訴林洋港：「日本人不自量力的侵略中國，蔣委員長一定會打敗日本。」

三、從事政治

林洋港在結束日本的留學，返回臺灣後不久，日本就宣布投降，臺灣光復，對於有中國意識的林洋港來說，擺脫了限制臺灣人發展的殖民者，回歸祖國的懷抱是十分振奮的，因此林洋港選擇了政治學系，希望能夠進入政府機關服務。但旋即發生了二二八事件，對林洋港來說，家鄉南投縣魚池鄉頭社村並未受到重大影響，自己也並未成爲實質上的受害者，在日後回想起來，林洋港並不認爲二二八事件是省籍衝突所導致，林洋港認爲二二八事件的導因在於法治觀念的不同，⁴²可見林洋港在此事件中，並未對本省人和外省人士做出區別，因此沒有採取身分原罪的論述，而是將原因歸給可以再行教育的法治觀念。

林洋港在回憶錄中提到，在政治系就讀時，印象深刻的是並非學科內容而是薩孟武教授所說政治家的三種分類⁴³，以及對畢業生的訓話內容⁴⁴，一方面可見林洋港期望從事政治活動的想法，一方面也可見林洋港對於自我約束的重視。林洋港畢業後，由於要扶養家庭，於是婉拒了薩孟武教授的邀請，決定先行就業，並調回南投縣以便照顧家庭，由於林洋港 18 歲就結婚，且已有兩名女兒，家計和照顧家庭便爲其考慮就業的首要目標，而選擇了與其所學謀合的公務人員以圖穩定的工作，並且也爲了升遷的必要，加入了國民黨，開始了一連串未曾想過的政治生涯。

四、二重疏洪道與梨山果樹

林洋港的政治生涯前期雖然並非一帆風順⁴⁵，但由 40 歲開始，林洋港當選南投縣縣長後的發展可謂平步青雲，歷任兩屆南投縣縣長，省政府建設廳廳長，臺北市市長，省政府主席，內政部部長等職，就在林洋港聲勢如日中天之際，卻因爲

⁴² 官麗嘉，1995，頁 41。

⁴³ 有學有術爲上等，有學無術爲中等，無學有術爲下等。

⁴⁴ 薩孟武教授對政治系畢業生的演說：「台大政治系畢業生現在在臺灣是僅此一家，將來應該都會有很好的發展。當升遷爲主管時，一定要記住，表面上的職銜是虛空的，若不持續充實自己，不用心思考，對所司之事不能充分了解、掌握，自然無以領導管理同仁，說不定反過來被屬下領導。而一個對職務用心、盡責的科員，很可能成爲實際的領導者。」

⁴⁵ 林洋港在 30 到 40 歲時爲爲南投縣行政課長，而大學同學有的已在省政府廳處擔任視察。

二重疏洪道與梨山果樹的問題，讓林洋港在中央的形象發生轉變。林洋港在南投縣積極進行基礎建設，建設廳廳長任內也成功整合自來水的統一經營問題、農田水利會和都市計劃的處理，臺北市長任內對信義計畫區的開發、翡翠水庫和建國南北路高架橋的興建，算是頗有建樹，也因此不斷就任要職，而其政治生涯最大的轉折點就在其任職省主席時發生。

在省主席任內，經濟部爲了德基水庫的水土保持，要砍伐當地果樹，林洋港爲務農出生，對農作物較有感情，當地居民集體請願，加上對於此次砍伐作業另有構想，便未同意經濟部砍伐果樹的建議，在二重疏洪道的問題上，更與行政院長孫運璿起了爭執，在未完成當地民眾的安置前，林洋港反對強行進行工程，而孫運璿則認爲爲了避免未來洪水氾濫，必須馬上動工，林洋港無法接受數萬民眾可能無家可歸的情況，卻又和孫運璿在理念上出現矛盾，林洋港沒有繼續頑抗也沒有放棄理念，而選擇提出調職的意願，結果接任林洋港成爲省主席的正是李登輝，並且李登輝同意了經濟部砍伐梨山果樹的建議，也同意二重疏洪道的進行工程。

五、競選總統

林洋港 1953 年加入國民黨，在 1996 年總統大選前已有 42 年的黨齡，對於國民黨有著非常深厚的情感，但在 1996 年的總統大選，卻冒著與國民黨爲敵的風險，毅然決然地參加選舉，也在 1995 年底被開除國民黨黨籍。在蔣經國過世後，國民黨陷入群龍無首的局面，擁李派和擁蔣派各有人馬，林洋港在此時雖被歸於擁蔣一方，但實則對於李登輝雖無私交但也並無不滿，也認爲李登輝剛繼任總統之位，應給其更多的時間與空間，對於林洋港來說黨內的團結無疑是第一要務，但卻時常在黨內大老或長官、長輩的人情壓力下進行抉擇。

1990 年，國民大會意圖推舉蔣緯國和林洋港搭配進行黨內的總統提名，其後在黨內大老的聯合勸說下，林洋港發布退選聲明，李登輝也當面對表達謝意，但蔣孝武對其叔蔣緯國的攻擊，讓重視倫常的林洋港感到非常訝異，也對幕後的操

作手腕有了份戒心，重大的心境轉折則是在林洋港訪美回國後，李登輝召見林洋港，並斥責林洋港為郝柏村辯駁一事，林洋港認為在國外表達出國家的團結並無不妥，而感到李登輝的器量不如預期。1993年，司法院副院長汪道淵準備請辭，李登輝隨口向他人提及使得請辭案曝光，不免讓人認為汪道淵是被掃地出門，重視團結氛圍的林洋港更是耿耿於懷，但也提及合作與否，一切的抉擇權都在李登輝身上，但李登輝仍逼走郝柏村、不會見孫運璿和謝東閔兩位國民黨大老、阻止郝柏村就任內定的黨副主席等作法，都使思想保守傳統、重視誠信、團結的林洋港對李登輝感到失望，認為在李登輝的領導下，政局漸趨不安，但林洋港對李登輝使包保持總統職務的尊重，私下也從未惡言批判。林洋港曾對子女說道：「競選中華民國第一任民選總統，我帶著的是一種「當仁不讓」的心情。為了扭轉台灣日趨不安的政局，為了中華民國兩千一百萬同胞長期的幸福與安定生活，再辛苦，再勞累，我都必須出來選，否則我這一生就辜負了國家對我的栽培，也辜負了人民對我的期望。」⁴⁶抱持著對國家的使命感，進而決定參選總統。

第四節 個案比較

壹、李登輝的成長歷程

李登輝出生於1923年1月15日的臺北州淡水郡三芝庄埔頭坑聚落⁴⁷，為家中次子，父親李金龍為臺籍的警察⁴⁸，擁有不錯的家境以及社會地位，也因此李登輝從小就能接受較完整的教育內容，李登輝在三歲時便被送到書房就讀，學習日語及漢文。由於父親職務調動的緣故，李登輝常常轉學，共讀過汐止公學校、南港公學校、三芝公學校最後於淡水公學校畢業，由於頻繁的轉學，李登輝在學校沒有太多朋友，大多時候都為獨自行動⁴⁹，李登輝也自認為因此養成他喜好思考、素

⁴⁶ 林明玲，1995，頁118。

⁴⁷ 今新北市三芝區埔坪里。

⁴⁸ 一說李金龍為警察學校畢業的菁英份子，時任刑警，一說李金龍並非警察學校畢業，而是因為日人治臺的警察以任用日本人為主，1920年後在規章上取消日臺人間的身分差別，因而補上成為下級警察，臺籍警察薪水為日本籍的一半，並稱為警察補。

⁴⁹ 林衡哲，2001，頁440。

描的興趣，1935年，李登輝於淡水公學校畢業，其後報考兩次臺北二中⁵⁰和臺北第二師範學校，但都相繼落榜，於是李登輝先在私立台北國民中學⁵¹就讀一年，1938年轉入由基督教長老教會設立的私立淡水中學。

私立淡水中學為五年制的學校，李登輝在此時期十分活躍，且大量閱讀日文書籍、修習劍道，受到日本文化強烈的薰陶，李登輝也承認自己喜好鑽研日本思想和文學作品，日本的思想、文化、傳統確切的影響李登輝的自我形成，1940年，在日本皇民化政策下，李登輝正式改名為岩里政男，1941年，李登輝以四年級生的身分考進了臺北高等學校，在當時臺人教育機會被限制的體制下，在五年制的學校內以四年級生的身分考入臺北高等學校，可見李登輝在成績上的優異，1943年，李登輝從臺北高等學校畢業，進入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農林經濟科就讀。李登輝在臺北高等學校時便接觸過馬克思主義，並認為要解決中國的問題就要從農業著手，故赴日就讀時選擇主修農業經濟，在大學時期，李登輝對馬克思主義深入著迷，讀遍馬克思及恩格斯之著作，同時由於日本的戰時體制，食物的配給不足，更讓李登輝想將馬克思主義和農業經濟進行結合，希望未來能到日本佔領的滿洲工作。但由於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李登輝自願從軍，中斷學業，1945年二戰結束，李登輝於次年進入臺灣大學就讀，1950年時獲得中美基金獎學金，赴美攻讀碩士，1953年取得碩士學位，同年返回臺灣，擔任過臺灣省農林廳技士、合作金庫研究員及經濟分析股股長及國立臺灣大學的兼任講師，其後李登輝至1972年前，都在農復會服務，並赴美取得博士資格。

曾參加過共產黨的經歷一直跟隨著李登輝，即使進入政府服務，但仍被懷疑與共產黨有關，曾被警備總部約談，無法出席會議等，直到1972年，蔣經國組閣時延攬李登輝入閣，從此李登輝的仕途生涯開始扶搖直上，王作榮認為李登輝被延攬入閣一方面是蔣經國的本土化政策，一方面蔣經國已觀察李登輝許久，⁵²李登輝並在1978和1981年相繼接任臺北市長和省政府主席的要職，並在1984年擔任

⁵⁰ 今成功高中。

⁵¹ 今台北市立大同高中。

⁵² 王作榮，2001，頁103。

中華民國第七任副總統，在蔣經國過世後，李登輝以副總統的身分接任總統，達到政治生涯權力的巔峰。

貳、成長背景和生活之比較

一、家庭背景

林洋港和李登輝相差 4 歲，同樣在日本殖民時期的臺灣成長，但兩人成長的家庭環境大不相同，李登輝為日本殖民時期警察家庭中的次子，父親李金龍有日本名字岩裏龍男，李登輝也在中學時改名岩里政男，李登輝自認從小受到父母溺愛，家境小康，父親同時也是小地主，⁵³擁有較多的教育資源與機會，對於臺灣底層民眾的生活雖有認知卻未曾親身體會，也因為在日本殖民時期有著良好的生活環境，在求學路上也有良好的發展，從小對日本就有著好感，自認在 23 歲之前都為日本國民。而林洋港則在農家出生，記憶所及幼時物質資源較為困乏，家庭教育十分嚴格，養父母十分用心栽培，獲得了赴日留學的機會，但從小的家庭教育或許影響了林洋港的身分認同，林洋港從未自認為是日本人，而是遭受日本欺壓的中國人，在家族方面，林洋港在自傳中時常提到長輩的教誨和對親人的感謝，而養家糊口的現實因素，也讓林洋港決定步入公職生涯而非選擇學者生活。

儒家思想十分重視家庭倫理的維繫，林洋港一直就生活在三代同堂的大家庭當中，育有四名子女，即使兒女相繼成家立業，也是維持著三代同堂的家庭，在林洋港的著作中，常能見到林洋港對家人的感謝之意。相反的李登輝除了提到生涯早年父母的愛護和教育外，不論在口述傳記或他人撰寫之書籍中，都難以找到其長輩的相關資料，李登輝於 1949 年結婚後，育有三名子女，但長子在 1982 年時過世，對李登輝造成非常大的打擊。兩人的成長與家庭背景有異，可能養成了對於中國、日本的不同印象，以及自我身分的各自定位，甚至是不同的思想上的走向和對於家庭的觀念。

⁵³ 許蓉華輯，1996，頁 48。

二、求學經歷

林洋港和李登輝都在日本受過教育，並就讀過臺灣大學，但林洋港在日本殖民時期報考臺中一中落榜後，前往日本留學，但未在日本考取大學，在日本殖民時期，林洋港未獲得進入精英體系的機會，臺灣光復後，林洋港順利考上臺灣大學，因為家庭經濟因素未繼續深造，而進入政府機關工作。相反的，李登輝在日本殖民時期，雖然落榜兩次但最後仍進入臺北高等學校，畢業後進入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就讀，並在 1968 年時獲得美國康乃爾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的學位，在求學的經歷上李登輝和林洋港都有傑出的表現，但李登輝選擇不斷深造，有著良好的學者形象，或許是對與知識的渴望，驅使李登輝追求學術上的成就，以達成自我成就的滿足和追求未來的發展，而林洋港則在大學畢業後進入政府部門，全心投入在工作上，由於有家庭的經濟負擔，林洋港未能脫離工作去求取學術上的成就，對於有強烈家庭責任感的林洋港來說，拒絕薩孟武教授的邀請，林洋港就已決定了走上公職的路途。

林洋港和李登輝在汲取知識的工具上，早期都以日文為主要工具，並且不斷使用，呂正惠認為：「從殖民統治的立場來看，日本，特別是東京，成為臺灣知識分子最重要的「留學」場所，也是非常自然的事。在這種統治架構下，這些知識份子難得有人到更先進的英、美、德、法各國留學，而唯一可以做為不同選擇的中國大陸，現代化的程度當然還不及日本。於是，日本就「壟斷」了臺灣知識分子的「現代化」視野，使他們在無法比較的情形下，不知不覺的就把日本當成最現代化的國家，從而把「現代化」與「日本化」相混而論。」⁵⁴李登輝在態度上一向親日，並十分推崇日本文化與思想，也出版過日文書籍，認為日本是進步且現代的，而林洋港雖然在態度上並不特別崇日，但在汲取新知上仍習慣大量使用日文為工具，於林洋港的書櫃之上存有大量日文書籍，可見在同樣的大環境下，日語做為唯一的知識汲取工具，對兩人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⁵⁴ 呂正惠，2002，頁 36。

三、仕途歷程

林洋港和李登輝在政壇中常被拿來比較，兩人皆為出生於日本殖民時期的臺籍政治菁英，擁有大學以上之學歷，林洋港和李登輝並且相繼接任臺灣省政府主席和臺北市長一職，兩人出生於相同的時代，有著相似的求學和從政經歷，卻也有著截然不同的思維、行事風格和自我身分的認同。林洋港在大學畢業通過國家考試取得公務員資格，成為地方的基層人員，並在 1953 年加入國民黨，1966 年獲得國民黨的提名成為南投縣長的候選人，在沒有家世背景的情況下，林洋港以省政府秘書和雲林縣黨部主委的身分被提名為南投縣長候選人，對林洋港而言是個很大的鼓勵與機會，並以極少的選舉花費當選南投縣長，開始受到國民黨的重視，歷任建設廳廳長、臺北市市長、省主席等重要職位，而林洋港自述除了參選南投縣長與離開省主席之職為自己的主動意願外，其餘的職務調動都是上級的安排，林洋港在加入國民黨後的十三年後，開始被國民黨重用並成為其中的菁英，蔣經國過世後，李登輝接任為總統並掌握了國民黨內的實質權力，林洋港才逐漸遠離並離開政治核心。相較之下，李登輝則選擇了以學者身分進入政府的不同系統，李登輝在美取得碩士之後，1954 年回國至農林廳服務，到 1972 年之前，除了赴美攻讀博士學位外，李登輝都在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中服務，但因曾加入共產黨的背景而受到刁難與懷疑，在李登輝 49 歲加入國民黨後才進入中央成為閣員，李登輝進入中央後表現出良好的態度與能力，受到蔣經國的賞識，和林洋港先後接任臺北市長和省主席的要職，並在副總統任內接任中華民國總統，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任本省籍總統。

林洋港和李登輝再進入政壇的方式和際遇都不相同，林洋港由基層人員做起，長期在地方服務，有著豐富的歷練經驗，加入國民黨後並未馬上獲得重用，直到四十歲時，開始成為政壇中的菁英，到了李登輝時代才逐漸遠離決策核心。而李登輝則以學者身分進入農林廳任職，並在待遇甚佳的農復會服務，但在王作榮的記述中，李登輝由於在美國找不到教職、申請聯合國糧農組織被拒，因此向

蔣彥士求助，回國擔任農復會技正，但由於在康乃爾大學時和獨派人士來往，並對政府有所批判，有匪諜和台獨的嫌疑，而遭到冷凍。⁵⁵在王作榮的推薦下成為國民黨一員後，李登輝開始平步青雲，兩人都經歷長時間的努力和機緣方才成為政府要員，但不同的是林洋港早年雖未獲得重用卻也並未被刁難，受到政府重視之時也比李登輝早了 6 年，在回憶錄中對此十分釋然，並未多做琢磨，而較年長的李登輝則曾被政府懷疑，有著被警備總部約談和無法出境的紀錄，49 歲時才成為政府要員，在此之前李登輝對國民黨政府則頗有微詞。雖然林洋港和李登輝最後都成為政治上的要角，同樣擔任過臺北市長和省主席等要職，但兩人並未有太多的交集，在進入政壇的途徑和心態上也有著不小區別。



⁵⁵ 戴國輝、王作榮，2001，頁 29。

第三章 思想內容與源流

第一節 中心思想

壹、思想發展

林洋港從小就受到儒家文化的薰陶，由童年時期開始，就有接觸四書五經，父親林生傳除了講述論語外，也將「孔子公」掛在嘴邊⁵⁶，對林洋港來說，孔孟學說並不陌生，但在日本殖民的體制下，無法在學校深入研究，反而在日本留學時期，得到更多接觸四書五經的機會⁵⁷，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與研究。儒家文化內涵甚廣，個人方面包含修身、道德層面以及技藝⁵⁸上的要求，在政治上有作為與不作為的原則理念，深刻的影響中國的政治治理，對禮法的重視和身分位階的清楚分別，也影響了中國的傳統觀念。一般認為孔丘為儒家學說的代表人物，其後在孟子、荀子、朱熹等人身上都有不同見解的分歧走向，但都不脫對君子自我內在修身涵養的要求、詩書禮樂的重視、禮法制度和君臣父子的身分定位的基本主軸。林洋港在各個場合的發言、演講，都時常以中國古代寓言、論語和菜根譚的內容作為例子，可見林洋港的思想內涵是以儒家文化為主體，其中林洋港自認菜根譚和論語對其影響最深⁵⁹，是為最核心之部分。

林洋港很早就開始接觸漢學，四歲時就開始背誦三字經，林洋港的養父林生傳對漢學頗有涉獵，在林洋港年幼之時就常為林洋港講解論語，常以「孔子公是怎麼講的？」來教誨，由於出生在日本殖民時期的臺灣，林洋港在公學校就讀時，學校以日文教育為主，並無教授漢學，特別的是，林洋港公學校畢業後，報考臺

⁵⁶ 林洋港，1992，頁 14。

⁵⁷ 日本教育強調服從精神，中國儒家思想在德川幕府時代便被大力推廣，林洋港赴日留學時，以中文原文為文本，日文註釋的方式學習。

⁵⁸ 儒家六藝為禮、樂、射、御、書、數。

⁵⁹ 林洋港，1992，頁 168。

中一中落榜，進而赴日留學時，方才延續並精進了林洋港對於漢學的認識。

於日本東京昌平中學學習的林洋港，遇上了漢學家橋健三校長，親自講授四書五經、批判日本的侵華行爲，對林洋港來說，一個日本人都如此重視中華文化，並直言批評日本的軍國主義，讓林洋港十分佩服其道德勇氣，且更認真地學習四書五經⁶⁰。林洋港對於早有接觸的四書五經十分有親切感，加上佩服校長的精神，讓林洋港在日本時，橋健三每周兩次的授課是採自由聽講，林洋港也從未缺席，一方面打下了漢學基礎，一方面也讓林洋港將這些中國傳統文化奉爲圭臬，影響林洋港所有的行爲思想。

林洋港的形象一向是穩重、踏實，但實際上林洋港自認年輕時也是個血氣方剛的急性子，林洋港由日本留學歸國後，先擔任地方的代課教師，養父送他一雙稍大的皮鞋，並說道：「大一點才好，這樣你爲了怕鞋子掉了，就會走慢一點，藉此可磨掉一些躁急的個性……」⁶¹希望能磨練林洋港的耐心，林洋港在臺北市長任內時接觸《菜根譚》一書，但只有粗略的瀏覽，直到擔任省主席時，自認在修養上仍未夠成熟、圓融，故而潛心閱讀、抄寫，而菜根譚也成爲林洋港最常提及的書籍之一，故本章將以論語與菜根譚兩本儒家典籍的內涵爲主，分析林洋港的思想內涵與其汲取了甚麼樣的內容。

貳、典籍源起

一、論語

(一) 儒家經典

《論語》是孔子的弟子與再傳弟子所編，成書年代約在春秋末期至戰國初期，由於成書年代久遠，《論語》被認爲有遭到刪減或後人新編，但並不影響《論語》

⁶⁰ 林洋港，1992，頁 156。

⁶¹ 官麗嘉，1995，頁 31。

的豐富內涵⁶²，《論語》內容為孔子與其弟子言行之紀錄，表現了孔子對於德行、出仕、禮樂制度等方面的思想，孔子認為的君子必須同時具備能力和德行，而德行是孔子最為重視的環節；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一方面可見孔子認為德高於才的見解，也可由孔子對周公之讚譽看到儒家入世思想之端倪，王開府認為：「倫理道德為儒家思想的出發點，也是歸宿點。在儒家看來，做人最基本的努力，是修養合於仁義的道德人格；人生最從高的目標，是實現合於人性的道德理想；人類最偉大的事業，是建立合於倫理的禮樂文化⁶³。」儒家學說在中國一直佔有重要地位，查正賢認為：「孔子被視為儒家學說的創立者，他的思想很快就由弟子們傳播開來而成為當時的顯學，最終成為中國傳統社會中的主導思想。」⁶⁴可見由孔子為首的儒家學說為中國之顯學同時為主體之思想，同時也受到國外學者的關注，世界各地都有不少介紹孔子的著作以及對《論語》的注疏。

（二）仁與修身

修身是儒家對於自我的要求，是有次序和目的性的修養作為，《禮記·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論語》中並未出現「修身」這個詞彙，但討論修身的內容篇章卻超過《論語》篇章的三分之一⁶⁵。孔子的中心思想為「仁」，在《論語》中討論「仁」的部分很多，例如：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可見「仁」是孔子思想中的重點，

⁶² 查正賢，2007，頁7。

⁶³ 王開府，1986，頁33。

⁶⁴ 查正賢，2007，頁4。

⁶⁵ 張德文，1996，頁82。

也是成爲君子所不可或缺的內涵，修身的目的是成爲堯舜般的聖人，除了在身心的修養上也必須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積極入世。「仁」是德行爲的規範，在宗法之中以忠、恕、恭、寬、信、敏、惠等待人接物的規範，轉換爲內心的自覺，以實現從道德實踐角度看，「仁」是以「孝悌」爲基礎並強調「忠恕」等的行爲規範⁶⁶，並透過自省的方式對自身去惡從善，可見《論語》在修身的論述中，是以有德且有能之君子爲主體，追求並保有「仁」的概念與行爲，並透過不斷自省的方式達成修身的目的。

（三）禮

《說文解字》：「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從示從豐。」「禮」在原始意義上是祭祀的器皿或是目的，而祭祀的相關規定逐漸成爲禮儀制度，並隨著時代的變化，擴展到政治生活之中。孔子的教育內容除了希望培養出德材兼備的仕紳君子，也包含了對整體社會規範的具體內容，禮除了是制度上的規範外，也帶有確立身分階層、名分的意義，並且是在以刑治民下的道德性潤飾；⁶⁷司馬遷：「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史記·孔子世家）其中禮、樂的部分，不僅爲薰陶德行的重要環節，更是治理國政的重要方針。「禮」在《論語》中出現七十四次⁶⁸，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可見孔子所認爲的君子，必須是學習過禮樂之人，而孔子認爲「禮」是治理國家的重要方式；同時也是「仁」的內涵之一：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林俊宏認爲：「孔子所談的「正名」不僅是強調了名實相符的觀念，也帶有一定的政治倫理的意含，進而可以看成作政治角色與相應的角色期待之間關係的適當化配置，而禮顯然是維繫這套配置的重要原則，兩者的關係是表裡依存著的。」

⁶⁶ 張德文，1996，頁 87。

⁶⁷ 林俊宏，2000，頁 17。

⁶⁸ 楊伯峻，1980，頁 311。

⁶⁹孔子的「禮」不僅是單純的規範儀式，也是國家治理層面的重要環節，同時「禮」的各種規定配合宗法制度維繫儒家的倫理道德，也成為所有儀式、位階、言行、服儀的依據，不合乎「禮」的行為則不可進行，但「禮」的定位並非僅以強制規定的嚴格規範，同時也是待人接物的方式，並有著期望以道德的方式自省、自覺而帶有倫理上意義。

二、菜根譚

（一）作者與時代背景

《菜根譚》為晚明萬曆年間之作品，作者洪自誠，號還初道人⁷⁰，對儒、釋、道三家有深入研究，晚明時局混亂，《明史·神宗本紀》評道：「明之亡實亡於神宗。」明神宗曾連續二十八年不上朝，宦官把持朝政，在官場打滾若不趨炎附勢則難以上位，不願同流合污的讀書人多半寄情山水，等待時機到來。洪自誠生平經歷不詳，但由其作品《仙佛奇蹤》得知⁷¹，洪自誠早年熱衷功名，但並不得志，晚年歸隱山林，宋儒汪革曾言：「得常咬菜根，即做百事成。」意思是若能忍受、適應困苦便能獲得成功，菜根為葉菜之根本，也代表芋頭、蘿蔔等食物，有著為人處世之根本以及忍受艱苦之義涵，于孔兼的題詞中引用了洪自誠之語：「天勞我以形，吾逸吾心以補之；天阨我以遇，吾亨吾道以通之。」為《菜根譚》之名增加了在逆境中堅持操守並尋求突破之含意。

《菜根譚》為一語錄體之著作，有明刻版和清刻版兩個版本，明刻版藏於日本內閣文庫，標有還初道人洪自誠著，由于孔兼題詞，共有三百六十篇，分為前後兩集，前集有二百二十五篇，後集有一百三十五篇，清刻版為常州天寧寺校刻

⁶⁹ 林俊宏，2000，頁5。

⁷⁰ 「還初」含有道家「反璞歸真」之意。

⁷¹ 《仙佛奇蹤》內提及「洪生自誠氏，幼慕紛華，晚棲禪寂。」

本，標洪應明著，前集有二百二十五，後集有一百三十四篇，共收錄 359 則，兩者在內容上相差甚遠，本文將以林洋港所閱讀的清刻版為本⁷²，《菜根譚》蘊含了儒家中庸、佛家出世和道家無為之思想內涵，其中不少詞句，例如：

「人情反覆、世路崎嶇。行不去處，須知退一步之法。行得去處，務加讓三分之功。」與「進德修道，要個木石的念頭，若一有欣羨便趨欲境。濟世經邦要段雲水的趣味，若一有貪著便墜危機。」的字句都可看出作者對人情冷暖以及自我修養的調解和訓示，而這種對自我修身處世的態度和對謙讓、寬恕、自省等人生哲理的重視，正是菜根譚的核心內容。《菜根譚》、《小窗幽記》與《圍爐夜話》並稱為「處世三大奇書」。

（二）從心出發

《菜根譚》的 360 篇章之中，「心」字出現了 126 篇之多，顯示「心」在《菜根譚》中的重要地位，「心」字同時也是儒、釋、道三家的主要內涵，在儒、釋、道三家之中，「心」的存在都是影響人外在行為的內在意向要素，如《大學》提及的：「欲修其身，先正其心。」、佛家對的「明心見性」和道家對人心清靜無為的追求，都顯示了「心」是各家的根本，同時「心」也深刻地影響了宋、明理學的發展，南宋陸九淵的「心即理」和王陽明的「良知說」則是在儒家的基礎上混合了佛家對「心」的看法，也因此晚明時期撰寫的《菜根譚》，對於「心」的認知中，同時也摻入了宋明理學中的佛理。

《菜根譚》重視正心與修身，有正心的需要也表示了「心」有正和歪的⁷³分別，而「心」的正欲和歪欲則會表現在外在的行為態度之上，例如自省、自律和傲慢、自私，《菜根譚》中的：「天理路上甚寬，稍游心，胸中便覺廣大宏朗；人欲路上甚窄，讒寄跡，眼前俱是荊棘泥塗。」意思是天理是寬廣之路而人欲為狹窄小

⁷² 筱田英雄所編之《日話菜根譚講話》。

⁷³ 閔建蜀，2009，頁 13。

徑，心的正和歪會讓心靈分別走上寬廣正道或是荆棘泥沼之中。

爲了保有純淨之心，就必須去除妄欲，儒家以不斷的自省來壓抑妄欲，道家則希望恢復最原初自然的純淨之心，佛家六祖慧能的偈語：「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表示只要不受外界的影響，就能保有本性，不產生妄欲⁷⁴，《菜根譚》中的一些篇章如：「夜深人靜獨坐觀心，始覺妄覺而自獨露，每於此中得大機趣。」、「今人專其無念，而終不可無。只是前念不滯，後念不迎，但將現在的隨緣得去，自然漸漸入無。」除了自省外，也有從中察覺自身妄心，去除舊欲以避免新欲的產生，先正其心而後可修其身，可見《菜根譚》在受到各家思想的影響下，對於影響外在行爲和各種慾念的「心」的重視，其最終目標是能去除妄念，保有原本面貌的「真心」。

（三）謙與誠

1、謙讓

《尚書》：「滿招損，謙受益。」老子也提及：「慈，儉，不敢爲天下先」，「不敢爲天下先」被認爲是謙的意思⁷⁵，謙是一種外在的表現，是「心」由內而外的體現，但「謙」在道家和儒家中有著不同的涵義，道家以退讓、柔弱的概念爲主，因此「謙」在道家的思想中包含了更多退讓的概念，而儒家則在看時間與空間的不同有著區別，《論語》：「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可見儒家並非講求不爭，在有追求的目標，例如仁的實踐上，就可以爲了仁而去進行「爭」的動作，是爲子曰：「當仁，不讓于師。」之意。儒家相較道家是有著入世觀點的，因此在謙的部分，儒家強調的是該謙則謙，該爭則爭，佛家則強調隨緣，而沒有爭奪的概念。

⁷⁴ 閔建蜀，2009，頁 20。

⁷⁵ 閔建蜀，2009，頁 85。

《菜根譚》關於謙讓的語句不少，每則所蘊含的謙讓之意也不盡相同，如：「徑路窄處，留一步與人行；滋味濃的，減三分讓人嗜。此是涉世一極安樂法。」表現的是爲了關係的和諧，以不爭的方式表現謙讓；而「人情反覆，世路崎嶇。行不去處，須知退一步之法；行得去處，務加讓三分之功。」則表現的是「窮則變，變則通」的道理，一方面爲了突破困境而有目的性的謙讓，一方面在順境時也要以同樣的態度行事；又「功名之士承以謙德，方不開嫉妒之門。」表現的謙讓則在避免遭人怨恨。《菜根譚》的謙讓並非只是單純個人的外在行爲，同時也必須在人們的配合下才會有其中提到的「安樂」，可見一方面作者對於人皆謙讓祥和的安樂之世的描述，但若是虛偽的暫時現象，互相謙讓將變成互相虛偽以對，因此這種謙讓必須是由內心真誠的表現，才能持久延續，方可達到《菜根譚》提及的安樂之世。

2、真誠

誠信可以作爲一種權術的工具，如徒木立信是爲了取得他人信任，而表現誠信的一種方式，這種誠信可說是一種工具，《菜根譚》中講述的「誠」並非這種因權術而生的產物，而是儒家思想的體現良知修養的真心誠意，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這種誠信是由真實的內心所發出，不同於爲求特殊目的的「偽誠取信」。《菜根譚》講述的誠，是一種對人的方式與態度：「信人者，人未必盡誠，己則獨誠矣；疑人者，人未必皆詐，己則先詐矣。」講的正是從自身做起，對人誠信或許他人未必誠實，但若懷疑他人，則自身已先成爲狡詐之人，以誠待人，人亦以誠待之。但真誠也不可缺少圓滑，《菜根譚》：「做人無點真懇念頭，變成個花子，事事皆虛；涉世無段圓活機趣，便是個木人，處處有礙。」待人處事不可無誠，但誠者若遇事不會變通，也會因此難以適應環境或和他人關係僵化，可見《菜根譚》在誠信方面，強調的是真心誠意對待他人，但仍能變通圓滑不失真誠的處世方法。

（四）菜根譚的管理學

日本的社會和企業嗜讀《孫子兵法》、《三國演義》和《菜根譚》，而《菜根譚》除了被認為是修身處世的經典之外，也被作為管理學說研究，在日本關於《菜根譚》的評注書籍就有十數種版本之多⁷⁶，作家皆木和義⁷⁷，以菜根譚和松下幸之助⁷⁸的名言結合出版《松下幸之助の菜根譚》，《環球》雜誌曾以：「論企業管理的書籍成千上萬，而從根本道理上說，多數抵不過一部《菜根譚》。」來介紹日本的《菜根譚》狂熱。《菜根譚》中「德者才之主，才者德之奴。有才無德，如家無主而奴用事矣，幾何不魍魎而猖狂。」和「毋因群疑而阻獨見，毋任己意而廢人言，毋私小惠而傷大體，毋借公論以快私情。」談論的用人首重德性和群體的做事之法，被認為是企業用人和任用員工的企業管理指南，吳家駒認為《菜根譚》廣受重視與歡迎的原因是其中蘊含著禪機佛理、哲人之語及道家仙骨、儒者風範，即使每個人的人生經歷不同都會有不同的體悟，但都會得到有益自身的東西⁷⁹。

第二節 思想的源流

壹、思想的內涵

一、佛儒思想的理解

⁷⁶ 近年常見版本有久須本文雄譯著《菜根譚》（講談社版）、今井宇三郎譯注《菜根譚》（岩波書店版）、守屋洋著《新釋菜根譚》（PHP 研究所版）、中村璋八、石川力山譯注《菜根譚》（講談社學術文庫版）等。

⁷⁷ 日本企業家、作家同時也是歷史研究者，著有《松下幸之助の菜根譚》、《企業の品格》、《稻盛和夫の論語》等著作。

⁷⁸ 松下電器、松下政經塾與 PHP 研究所的創辦者，有日本經營之神之稱。

⁷⁹ 吳家駒、黃志民，2003，頁 6。

林洋港從小接觸儒家經典，儒家思想給林洋港最大的啟悟是在修心、待人層面，林洋港認為儒家最高的思想「仁」與佛家的「慈悲」和基督教的「博愛」是相似的，同樣認為人人平等、鼓勵人們修身向善以及服務人權，在林洋港的理解中，佛教的中心思想是在慈悲行善，強調十善、四諦、十二因緣、六度，十善是不殺生、不偷盜、不妄語（謊言）、不惡口（不罵人）、不兩舌（挑撥離間）、不貪慾（貪求名利地位）、不淫邪、不邪見（客觀公正）、不瞋恚（平心靜氣）等各種良善行為，林洋港認為佛家的這幾種良善思想與儒家所提倡的是大同小異，多是從自身做起，不被他人影響甚至是去影響、導正他人，同時佛家也是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入世的思想存在⁸⁰，和儒家積極入世的宗旨相似，另外儒家的「有教無類」和佛家的「眾生平等」表現的則是共同的平等性，佛家認為人可以頓悟成佛，儒家也期望人修身自省成為聖人君子，可以發現林洋港在佛、儒學說思想中擷取了積極的面向的共同性質。

而佛家和儒家的相異之處在於儒家並非一種宗教，一個宗教會有個超乎人類存在的神祇並且有著偶像的崇拜，這些都是儒家所沒有的，儒家最重要的是內心的修養，以誠、敬、忠、恕為基礎向外推展，所謂「誠」是內心誠實正直、不虛偽狡詐，「敬」代表的是謙遜與對人的尊重，「忠」和「恕」則是外在行為的表現，「忠」可以解釋為對國家的盡忠和對個人事物的負責，「恕」則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理，林洋港認為世界上有所謂的「真理」，可在世界上通用，而儒家的修身和待人接物的理念就是如此，一方面是在人的關係上由親人推展到所有社會大眾，一方面是以誠、敬、忠、恕為基礎，擴大到禮、義、廉、恥和智、仁、勇等。

林洋港認為道德是一種自發的內在約束，法律雖然也是道德的一部分，但法律是外在的強制規範，只有從內在真心誠意地去相信和實踐儒家所提倡的正向觀

⁸⁰ 林洋港，1995a，頁 25。

念，才有辦法維繫社會秩序和促進社會祥和，儒家思想雖然是數千年前的產物，但待人處事的道理並不會隨著時代的演變而有所改變，這並非只有華人世界如此，而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⁸¹並在儒家思想的基礎下吸收佛家為善積極的一面，希望在利慾薰心的現在社會中，人們能重新重視品德修養，去惡向善，重建社會的道德與秩序。

二、基本信念

林洋港認為良好的品性是一切的基礎，人是社會的個體，只要有良好的品行，組成的社會也必然祥和，個人也容易成功，「一個人的成功，只有百分之十五是靠專門學識，其餘百分之八十五則是一於他們的品格和待人誠懇獲得信賴而來。」⁸²林洋港提出的基本信念為以下幾點：

（一）正直

不論在公領域或私生活中，都要表裡如一，公共上有不道德的行為會被法律處罰，而私領域中若不符合社會標準則無法取得他人的信任，林洋港曾言道：「怕別人知道的事情就不要做。」是其認為的正直的最好寫照。

（二）誠信

不虛偽，不玩權術，林洋港認為以權術手段將競爭對手擊倒的利己觀念，長遠下來會喪失他人的信任，如果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輕易答應⁸³，誠信是在社會上立足的根本。

（三）淡泊

林洋港擔任南投縣行政課長職位有九年之久，但也因為如此，在參選南投縣長時對地方更加熟悉，林洋港舉出自身經歷，認為充實自我，機會就會到來，如

⁸¹ 林洋港，1992，頁 171

⁸² 林洋港，1992，頁 133。

⁸³ 林洋港在參選南投縣長時，朋友建議在政見中增加爭取大學和鐵路在南投設置，但林洋港認為，無法做到的事情如果列上，或許可以增加選票，但卻會失去做人的基本道理。

果汲汲營營、不擇手段，則如「庭前春雪，當必潛消」。

正直、誠信、淡泊名利是林洋港的處事心態，同時也認為人要能吃苦耐勞，並且不斷學習，追求新知，才能在資訊爆炸的新時代不斷精進，更重要的是能堅定自我意志，不為外在事物輕易影響，林洋港以曾引余井塘的詩：「空言竟到無常策，讀史明知治有方，舉世昏昏愚懦，任由道喪惡魔狂。」來感嘆自己在建設建國南北路、翡翠水庫和為警務人員建立「警察傷亡濟助基金」時所受到的諸多攻擊，以及現代社會功利主義猖獗，道德日漸低下的情況，並以崔後渠的「六然觀」為自身的體悟與座右銘：「自處超然，處事藹然，有事斬然，無事澄然，得意澹然，失意泰然。」

三、家庭與平等

(一) 家庭關係

林洋港出生於農村的大家庭，家族關係和睦，家人用心的栽培也讓林洋港一直感懷在心，除了在各個演講場合都提到家庭的重要外，在個人的回憶錄和訪談中，也常提到對家人的感謝之意，可見林洋港對於家庭的重視。中國傳統的家庭觀念建立在孝道和倫理之上，林洋港認為孝道是古今中外都受到重視的道理，詩經有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小雅·蓼莪》），佛家也有《父母恩重難報經》都在講述父母照顧子女的大恩，歐美雖然沒有和「孝」同等意思的名詞，但父母與子女間仍強調互相敬愛，而孝道要在健全的家庭中去實現，林洋港從小就生活在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中，擔任公職的生涯也多和兒孫同住，認為三代同堂的家庭最為理想，對年長者而言，有兒孫在側可以含飴弄孫，是很大的快樂與安慰，對年幼者來說，有長輩可以就近照料，對人格發展有正面影響，夫婦之間則要互敬互助、容忍體諒，林洋港曾聽李遠哲教授講述，美國加州監獄的預算日漸高漲，監獄越

蓋越多，而就李遠哲教授發現，加州的單親、離婚家庭日增，有 30% 的新生兒父親不詳，如此一來美國社會不亂也難⁸⁴，林洋港認為，孝是道德的基礎之一，若能發揚孝道，則社會各種問題將會隨之改善，林洋港對於「家庭」的觀念有不少的論述，並不斷強調「家庭」是社會建構的核心內涵，一方面可見林洋港對於傳統道德的堅持，另一方面也可見林洋港對於家庭的重視。

（二）自由平等

林洋港最主要的思想源流來自儒家思想，對林洋港來說，儒家思想的「有教無類」含有平等的概念，但平等並非指齊頭式的平等，不是代表人人相等，沒有倫理尊卑之分，林洋港認為，平等的意義是人格上、機會上、職業上和義務上的平等，每個人的人格尊嚴、機會條件都是相等，並不因為任何外在因素而有價值上的差別或是條件上的限制；各種職業也都是社會所需，並沒有職業貴賤之分，沒有各行各業的人，群體社會則無法維持；在該負的責任和義務上，也不能有所謂特權免責的事情，而另一方面，傑出的人得到的待遇也不該強制和平庸的人「平等」⁸⁵，如此才是真正的機會條件上的平等。

關於林洋港對自由的理念，則來自就讀政治系時的各種政治學理論，林洋港舉出英國政治學家 Harold Joseph Laski（1893—1950）⁸⁶對自由的定義：「自由是一種不受外來的干擾束縛、壓制的狀態」，認為自由的本質是能夠不受壓抑的發展天性，但也非常強調自由並不代表「只要我喜歡，有甚麼不可以」，因此，自由需要

⁸⁴ 林洋港，1995b，頁 220。

⁸⁵ 林洋港舉出李遠哲在美國詢問美籍教授，自己獲得優異的待遇是否不平等，美籍教授回答：「這才是平等，今天你用功、智慧高，能得獎，所以能獲得好的待遇，如果我得獎，我也能有好的待遇，這才是機會條件的平等。」

⁸⁶ 英國工黨著名的理論家，著有《國家的理論與實踐》、《現代國家的權力》、《政治典範》、《論當代革命》等。

有紀律，不可侵害他人的自由和國家的公益，並非無限上綱的概念，而是需要有所限制或是指導的，林洋港舉出到歐美訪問的經歷，不論是修剪草皮、垃圾分類、集會遊行，其原因以及過程，都是爲了避免侵害到他人自由、利益或社會的公益。林洋港認爲不少人對於自由還有錯誤的認知，因此在不少場合都曾公開澄清自由的定義，希望日漸開放的社會，不會因爲對自由的誤解而滋生事端，對社會風氣造成不良的影響。

貳、思想的實踐

一、論語的實際運用

《論語》是林洋港最早接觸的儒家經典，《論語》一書帶有孔子的政治思想、修身觀點以及禮樂制度等等，在1994年，林洋港時任司法院長，於各地演說時都在大力推廣論語⁸⁷，對林洋港而言，《論語》給其最大的啓示是在道德修養層面，在提及最喜愛的書籍時，林洋港曾言道：「從早年讀書時代起，對於《論語》一書，覺得非常重要…尤其做人處世的一些原則，都簡明易行，使人易於接受。反覆閱讀體會，爲學、行政，終生用之而不盡，所以古人有「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說法。雖然時代進步，家庭、社會型態多變，但論語的精神，是隨著時代進步，萬古常新的。」⁸⁸可見林洋港對於論語的認同，部分是建立在爲人處事的方法之上，林洋港認爲論語是中華文化最爲基礎的書籍，無論如何都必須再三閱讀並且身體力行，即使在現在社會中，論語的精神仍然可以適用，其中有幾個要點：

（一）待人接物

⁸⁷ 林洋港在不少演講中提到可在家中或辦公室放本論語，有空時翻閱個三五則，對人格的陶冶和養成良好生活習慣都很有幫助。

⁸⁸ 吳月蕙，1988，中央日報副刊。

林洋港認為，現在社會多元多變，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價值觀和行事風格，有時會因此產生衝突，但只要自身能懂得一些待人處事之道，那麼不論身處何地，與誰相處，都能堅守自身定位，適應周遭人事而和諧融洽，林洋港認為所有有成就之人士，必有其立身處世的原則和信守不渝的道理，並提出誠信、寬厚、實在、耐煩四個重點為座右銘，誠信具體的表現為：對父母孝、對子女慈、對國家忠、對兄弟愛，這種信賴是一切行爲的根本；寬厚指的是基於內心的仁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實在則代表安分守己，腳踏實地的努力；耐煩即是忍耐、定力，在容易煩亂之時，也要能平心靜氣地去研究討探討，林洋港並舉出孔子所說：「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認為不論社會如何複雜，只要在待人接物上保有誠信、寬厚、實在、耐煩等特質，必然能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得到想要的回應，但也不表示林洋港是個以不得罪他人為第一的老好人，林洋港曾表示：「通常，我對涉及個人的批評，總是不加辯駁的，否則以後朋友就不敢向我進言，鼓勵我進步了!但是，當批評的言論，可能影響社會的價值觀念與是非標準時，讓我說一句比較不客氣的話，我就會「當仁不讓」，提出我的看法了。不然的話，大家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不分，整個社會的是非價值和價值觀念，就要錯亂了，因此，我不得不說幾句話!」⁸⁹

可見林洋港的和諧融洽觀念，並非只在自身周遭，而是推展到社會當中，將社會的道德秩序視為己責，他人對自身的批評則虛心接受，但如果是誤會或是錯誤的觀念，林洋港會為了不讓錯誤的觀念影響一般民眾，而加以澄清反駁。

（二）立身之法

林洋港非常重視人的道德操守，認為人類在歷史上不斷的在追求三個層次的生活：首先是求溫飽，其次為能過小康的生活，最後為互相關懷、幫助的融洽群

⁸⁹ 聯合報，1979/6/9。

體生活⁹⁰；而由於功利思想盛行，道德觀念逐漸為人所遺棄，因此除了建立自身的道德準則外，處事上也必須有其基準，方能在多元化的社會中保有自我，首先，林洋港舉出《論語》子罕篇記載：「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以及里仁篇中的：「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作為自制的基準，也就是沒有私心，保持客觀超然的立場，不固執的堅持意見，如此才不會陷入剛愎自用的泥沼之中。其次，林洋港也強調慎言的重要，慎言並非不言，而是要在不同的身分、場合講出適當的話語，言論可以製造紛端也可以促進人際關係的和諧，在民主化的社會中，人人享有言論上的自由，因此更需要注意言論的真實性與適當性。林洋港認為「非禮勿言」在過去是跟隨身分或制度而改變言談方式與內容，在現代則可視為因應不同的角色而去談論或不談論，「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則表示言談也要注意時間的因素⁹¹，最重要的仍是在良好的道德修養上，時刻自省，方能不致迷失在扮演的同角色當中。

二、菜根的修養

（一）吃苦耐勞

林洋港在 50 歲時才開始研讀菜根譚⁹²，而菜根譚很快地就成為林洋港最常提及的書籍之一，林洋港認為閱讀菜根譚，能夠讓人在逆境中找到有益的方式或是自我調適的方法，書中重視道德、和諧的人際關係、簡樸的生活和寬廣的心胸，道德和人際關係是林洋港從小在儒家文化的薰陶下就極為重視的層面，菜根譚對林洋港最有助益的是在精神修養的部分，林洋港曾提及自己是天生的急性子，因為自覺修養不足、不夠圓融，而開始研讀菜根譚。

作者取名菜根就帶有吃苦耐勞的意味，林洋港舉出曾國藩的「耐冷」、「耐苦」、

⁹⁰ 林洋港，1995a，頁 78。

⁹¹ 林洋港，1995a，頁 99。

⁹²

「耐煩」、「耐閑」等四耐要求自己，耐冷指的是一個人貧困時的世態炎涼，要忍得住人情冷暖；耐苦是期許自我能夠安貧樂道，所謂「凡事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於心。」各種不順遂、誤會或是攻擊，都有撥雲見日的一天；耐煩是林洋港最有感觸的一點，林洋港提到有時人際關係來往頻繁，曾有客人來訪訴說其訴訟中的案件，林洋港感到不耐，繼而告知不便介入審判，回憶起這段往事，使林洋港感到自身耐煩的修養不足，另一方面繁雜的人際關係多發生在當權、得勢之時，故必須避免驕傲得意的心態，以免在自滿下在道德上出現缺失；耐閑一方面是在仕途不順時能轉而沉潛自修，一方面是在退休後的生活要能尋找新的目標，能夠達成「四耐」的修養，並且保持樂觀、知足、惜福的人生態度。

（二）社會責任

菜根譚有云：「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故君子當存含垢納汙之量，不可持好潔獨行之操。」一方面指君子要有寬廣的心胸，包容仁厚，另一方面也表示君子不可獨善其身，更要兼善天下。林洋港在個人的道德和修養上有不少的心得和堅持，除了對「道德」本身的重視外，更重要的是對群體生活的影響，林洋港認為道德觀念的低落和修養上的不足會影響個人的心情與其周遭的人際關係，更重要的是會影響國家社會的團結祥和風氣，在精神修養上菜根譚有：「念頭寬厚的，如春風煦育，萬物遭之而生；念頭忌刻的，如朔雪陰凝，萬物遭之而死。」之言，在人際關係上有：「完美名節，不宜獨任，分些與人，可以遠害全身；辱行污名，引些歸己，可以韜光養德。」

既然人構成了社會，而品德操守會影響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和信任，如菜根譚所云：「憂勤是美德，太苦則無以適性怡情。澹泊是高風，太枯則無以濟人利物。」「道德」在林洋港的理解中就不再只是為了避免爭端，而是能更進一步，促進國家群體和諧的基礎。不過林洋港也認為，菜根譚一書雖然對於處於艱困環境的人有著很大的鼓勵和幫助，但也由於其中圓融謙讓的特性，林洋港並不建議年輕人

閱讀，以免影響了年輕人特有的銳氣與衝勁。

第三節 個案比較

壹、李登輝的思想內涵

一、武士道的精神

日本過去的社會有著明顯的階級分野，武士是爲了大名⁹³效力的戰士，身分高過一般平民百姓，在日本戰國時代，武士背叛大名的事例多不勝數，德川幕府建立後，開始積極推廣以「忠」爲主要思想的武士道。武士道是一套道德規範，對所謂的「武士精神」有著諸多的規範⁹⁴，同時也是日本人的道德準則，武士道的精神來自中國的孔孟儒學，在日本被混和於佛教和日本的神道教之中，在德川幕府的推廣下，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廣泛的存在日本社會之中。李登輝出生於日據時期的親日家庭，對日本文化本就十分推崇，李登輝認爲武士道爲一種集體精神，使人民能夠在這種精神的薰陶下嚮往公義，而武士道的內在精神除了儒家的個人品德修養外，還有對於真理的思辨與探索，李登輝期待這種對思想的探索思辨能注入到人民的精神生活之中。

李登輝在《武士道解題》一書中寫道：「對於總統任內十二年的奮鬥，我自認確實能一貫始終地朝理想奮鬥前進，內心最大的支柱，就是早年日本教育打下的『大和魂』精神，也就是『武士道』精神。」李登輝認爲武士道的精神當中充滿忠、義的德行教育和對自我嚴格的規範，而李登輝自認要成爲真正的領導人，必須追求武士道的公義精神，並且有殺身成仁、犧牲奉獻的決心，武士道的精神正是支持李登輝從日本殖民地居民到當上國家領導人的重要思想內涵⁹⁵。

⁹³ 日本封建時代領主的稱謂。

⁹⁴ 新渡戶稻造，2003，頁9。

⁹⁵ 柯義耕著，蕭寶森譯，2008，頁90。

二、基督教的信仰與馬克思主義

李登輝在就讀淡水中學時開始接觸基督教，但並未深入的研究，而是置身於禪學的思辨之中，並開始接觸黑格爾、康德、尼采等思想家的作品，沉浸在形上學的精神世界當中，但面對現實世界，在二次大戰的影響下，物資缺乏，貧困的人們只爲了求生存的現狀，讓李登輝轉向到重視物質的唯物論，選擇研究農業、熟讀馬克思主義，希望未來能到滿洲國進行農業的發展活動，並在赴日留學時成爲共產黨員。

馬克思主義的論述是以「階級」爲各種爭端的主要源頭，資本家使用各種方式希望能降低成本，並在出售時追求最高的價格，以取得最高的利潤，馬克思將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所得，提出「剩餘價值」的看法，馬克思認爲人的勞動與價值，不能和金錢直接劃上等號，對資本社會無掩飾的直接攻擊，在二戰期間，生活普遍貧困的社會中，追求公平正義的馬克思主義成爲一種風潮。當民間物質生活有了起色後，李登輝又開始重新省思自己的精神內在，並在一向仰慕的新渡戶稻造的提倡下加入的基督教，並立下到山區傳教的志願，而在後來多次遭遇挫折時，李登輝也在信仰的幫助下重新站起。事實上，當時中華民國政府的高層人士，如蔣中正、蔣宋美齡都信仰基督教，不過不同於這些外省籍人士選擇的美以美教會，李登輝選擇的臺灣長老教會在臺獨色彩上是較爲濃厚的。

三、黑格爾的否定思辨

黑格爾認爲否定是精神動力的泉源，黑格爾認爲，事物要不斷經過否定與在否定的過程，最後達到「絕對精神」，所謂的真实是靠著不斷地否定、思辨、揚棄而能達到，而世界的本身是「一個歷史的行進，其中每一個相續的運動都是爲解決前一運動中的矛盾而出現的」。在思辨的過程中不斷地否定，在不斷變化的過程中達到和諧，是黑格爾著名的「正」、「反」、「合」三段辯證，而觀察李登輝的生涯經歷和發言內容，會發現李登輝在不同時期都不斷地在否定、改變過去的自我和思想，諸如對自我身分的認同、目標的改變、人際關係的互動，

黃鈺淳認為：「李登輝提出黑格爾式「命運共同體」的概念時，正---反---合的辯證思維便昭然若揭，中國的崛起可能是造成日、中爭奪亞洲主導權的場面，夾雜在中間，國力確有差距的臺灣很難與之匹敵；和晚期西田幾多郎的辯證法不同的是除卻正、反的對立外，還要找到一個統合的方法，所以李登輝選擇結束動員戡亂體制，就是希望揮別歷史包袱，停止宣傳反攻大陸，另連心中原，迎向他的所謂的歷史的開端。」⁹⁶由此可見李登輝在生涯中的各種決定，在每個階段都不盡相同，或許就是由於李登輝受到黑格爾不斷否定思辨的影響，使其在各種立場和認同之間不停進行辯證。

貳、思想內涵的不同

林洋港和李登輝同為日本殖民時期出生的臺籍政治菁英，但兩人在行事風格和思想內容卻是大不相同，林洋港的家庭教育以中國傳統教育為主，在日本殖民教育下，林洋港選擇赴日留學反而吸收了更多關於四書五經的知識，而從小聽從的儒家思想，在生涯中從未改變，林洋港雖對各家學說、思想有所涉獵，但都是以儒家思想為基底，進而進行了解，例如當林洋港提到佛學時，是認為佛學的救世思想與儒家的有教無類在平等和積極入世的觀念上十分相似，儒家思想不僅是林洋港在口頭講述和自認信服的學說，更在林洋港寬厚的個性和行事風格中充分的體現。林洋港的思想內涵中，除了儒學外，就是佛、道兩個對中國社會有深入影響的學說，最具體的是林洋港在汲取菜根譚的思想，菜根譚本身帶有的儒釋道三教思想，被林洋港所吸收，在行事上風格追求寬厚、團結；在心態上追求平靜淡然；在心態上追求積極付出。儒家思想成為林洋港思想的核心，其中，林洋港對於道德的重視，可說是林洋港對於儒家思想的最重要的汲取內容，林洋港認為道德教育是社會的一切，只要能在道德教育上做出改善，國家、社會之風氣也會隨之祥和，在林洋港的思想架構中，以儒家思想為主，並在發言中引述神學、

⁹⁶ 黃鈺淳，2010，頁 105。

政治學、保健養生、歷史故事，涉獵之範圍可謂不少，但除了自由、民主的概念為歐美新知外，對其餘知識林洋港都是以儒家的概念進行理解和吸收。

相較於林洋港，李登輝在思想的內涵上多元許多，李登輝有赴日和留美的經驗，在不需要擔心家計、付出勞力的情況下，李登輝有較多的時間投入於形上學的思辨當中，不同於林洋港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思想核心，李登輝自詡深受日本武士道精神、基督教、黑格爾、馬克思等學說、思想的影響，由於對日本文化、身分的認同，李登輝接觸武士道思想的時間非常長久，並在中學時投入劍道和禪學的世界當中，武士道中的禪學和基督教的神學、黑格爾的否定辯證，可以看出李登輝對於形上學思辨的熱愛，而以李登輝的生涯經歷來看，黑格爾的否定辯證或許才是其最核心的思想內涵，而不斷地否定思辨，或許可說是李登輝以其性格好惡為基礎之上，去汲取反思自身所需之理念的方式。

不同於林洋港從心底認同儒家道德，並且認同道德對於國家社會之益處的實際面，李登輝不斷的在追求心靈上的滿足，不斷的在黑格爾的思辯中否定與改變，李登輝自述受到母親溺愛，但在中學時又迫切的想離開家庭生活；於留日期間加入共產黨，在 49 歲的時候又加入了中國國民黨；由原先對一個中國的同意轉向到支持臺獨，而在 2008 年時又有「我不是臺獨份子，我也不主張臺獨」的發言，可以看出李登輝的矛盾或是不斷否定的思想辯證，造成李登輝立場上的不斷擺盪。

另一方面，林洋港和李登輝在行事風格上大相逕庭，林洋港講求團結、和諧，對於他人的行為也少有負面的揣測，也因此在各個重要決定中，都以黨、社會的和諧為最大考量，徐立德認為，林洋港儒家式的作風對其政治生涯有良好的助益，但在重要決策時也往往因為儒家的謙讓使林洋港失去機會和舞臺。⁹⁷相反的李登輝在蔣經國過世後，不少和黨內鬥爭和攻擊性的言論都和主張溫和處事林洋港大不相同，並對於權力的爭奪十分敏感。⁹⁸以兩人的著作來看，林洋港的著作不多，以傳記為主的回憶錄類型，多提及行事的想法和得之於他人的恩惠，少有對於他人的批評，而李登輝的相關著作數量十分龐大，除了闡述自己的政治理念、心路歷

⁹⁷ 徐立德，2010，頁 147。

⁹⁸ 李登輝於《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一書中提及，宋楚瑜和蕭萬長的不滿態度，應來自於自己沒有「論功行賞」。

程外，卻也有不少對他人的批判以及權力鬥爭的內容，部分書籍的「人」、「事」內容都遭到質疑，⁹⁹王作榮認為，李登輝是由於天生的心胸加上信奉的武士道並非強調忠義、誠信的上級武士道，而是求勝、唯力是尚、無信守的下層武士道，而常有較為激烈的舉動。¹⁰⁰

林洋港和李登輝在思想上最大的差異是在對於學說的汲取之上，林洋港汲取的是儒家的忠、恕、孝、仁等基本道德觀念，並且將之運用在待人處事和日常生活之中，並塑造了林洋港的性格，李登輝在思想上則包含了武士道、基督教、馬克思、黑格爾等多元內涵，並成為李登輝對形上學的思辨基礎，李登輝對形上學的不斷辯證與吸收，或許跟喜愛黑格爾有關，而在不斷地「正」、「反」、「合」三段辯證之下，李登輝無法確定何者為最後達到的真實，因此以其性格為基礎，吸納各種所需的思想內涵，也因此在各個不同的時空下，李登輝的思想和行為也不斷地隨之擺盪，造成同樣時代的臺籍政治菁英，卻有著南轅北轍的行為和思想內涵。



⁹⁹ 蘇起，2003，頁 73。

¹⁰⁰ 王作榮，2003，頁 29。

第四章 中國認識與印象

第一節 中國之概念

壹、中國與中華

一、中國的內涵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傳說中由黃帝開始建立道統的體系，從史前史的堯、舜、禹、夏至信史開始的商、周，其後則由最強大的政治勢力建立朝代，並承襲道統的延續，華夏為一族群之稱呼首見於《尚書》¹⁰¹之中，漢朝開始有了漢族的名詞出現，在歷史上經歷不少朝代的更替與不同民族的統治，但未改變中國以自身固有文化為基礎，來同化不同文化的異民族，使之成為華夏民族的一員，中國的「中」表示了地理上的方位，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有「中」代表有著「四端」，而也有著中庸、順和之意，而作為一個地理名詞，則有京師、中原地區之意，中國歷代朝代雖都沒有以中國為號，但都使用中國為通稱，到了明代則出現了主權國家之意涵，¹⁰²但都不脫朝代變換的統一歷史觀。

「中華」一詞常被用在文明和歷史的論述上，「華」則被認為與帝舜之名有關，因此舜所屬之部落也被稱為「華」，「華」在《尚書》中被用來形容服飾之華美與尊貴之意，「華」代表著周人對自身文化的自尊、自豪。簡言之，並蘊含著「正統」之思維，以「諸夏」、「諸華」稱呼接受周文化洗禮的部落勢力；相對地，未接受周文化傳統的則為「蠻夷戎狄」，¹⁰³中國在隋唐經歷與異民族的大融合，元朝更是異民族所建立之朝代，這些異民族都有著某種程度上的「漢化」，「夷夏可變」的觀念代表著在夷、夏在地位上的可動性，在文化和價值觀念上有

¹⁰¹ 《尚書·周書·武成》：「華夏蠻貊 罔不率俾。」

¹⁰² 卞敏，2008，頁 26。

¹⁰³ 石曉軍，1992，頁 16。

較高水平者則為華夏，但實際面上，中國人認為中華文化正是華夏的代表，從未放棄這文化上的優越感，中國歷代以和番、文化交流的方式與異民族間的互動，都帶有著以文化、價值的同化，使得異民族成為華夏的一份子的想法，但文化傳播的主客體仍會因為國家的實力而有所反轉，例如中國與日本間的關係在二戰間就發生重大的轉變，可見中華擁有文化、歷史以及民族群體上的意涵，對中國而言中華代表了固有的文化，但對鄰近的日本來說，在國力的此消彼長間，對中華有了不同的見解。

二、二戰時期日本的中國觀

日本殖民臺灣長達 51 年之久，對同樣傳承中華文化的臺灣人，日本對中華的認知，勢必影響了其對臺灣的統治方針。歷史上，日本長期以儒學為師，吸收中國的文化內容，偶爾並進入中國的朝貢體系之中，17 世紀滿人征服中國，異民族的王朝讓朝貢體系中的諸國，對於滿清的「中華」提出質疑¹⁰⁴。德川幕府時代的儒者開始對滿清的中國是否還配擁有中華之名進行批判，例如五井蘭州（1697-1762）就認為稱滿清的中國為中華，等同於自認為夷狄，¹⁰⁵這不僅是日本對於中華稱呼的爭論，更是對滿清的中國與日本的上下階層的省思。而日本的中國觀在明治維新後發生巨大的轉變，西化後的日本對於腐舊的中國產生了劣等的觀感，福澤諭吉有名的「脫亞論」中談到甲午戰爭的意義是「策畫文明開化之國家與妨礙文化進步之國家之間的戰爭」，著名的反戰主義者內村鑑三認為日本是「東洋進步主義之戰士」，中國則為「進步的大敵」，日本對中國的看法除了在位階上的逆轉外，同時在民族主義高漲的時代，開始藐視中國，在日本國內甚至發生「漢文廢止運動」，可見日本在此時對於中國不僅是有輕視的心理，並想擺脫「落後」的中國

¹⁰⁴ 黃俊傑，2007，頁 325。

¹⁰⁵ 五井蘭州：「近世文人，乃稱為中國中華，是甘以夷狄自處也。」

的影響。故日本佔領臺灣之後，這種輕視中國文化的觀念，對於深受中華文化影響的臺灣，造成不小的衝擊，鍾理和（1915－1960）就曾回想日本的教育內容：「日本老師時常把「支那」的事情說給我們聽。…兩年之間，我們的耳朵便已裝滿了支那、支那人、支那兵等各種名詞和故事。這些名詞都有它代表的意義，支那代表衰老破敗；支那人代表鴉片鬼、卑鄙骯髒的人種；支那兵代表怯懦、不付責任等等。」¹⁰⁶也因此在日本殖民時期的臺灣人中，有部分人因為對日本的反感而保有對中國的思念，而部分人則發展出對於中國的負面印象。

第二節 身分認同發展

壹、林洋港的自我身分認同

一、中國人認同的建立

林洋港對自我身分的認同於童年時期萌芽，林洋港的家庭有濃厚的中國傳統思想，長輩也有著身為中國人的身分認同，林洋港的養父林生傳，在林洋港童年時期，日本攻佔南京，村中日人張燈結綵時，就曾說道：「真是欺人太甚！欺負我們，還要我們來慶祝！還好有蔣委員長在領導我們抗日。中國這麼大，日本做餡讓我們包都不夠！他們一定會打敗的！」¹⁰⁷對年紀尚小的林洋港來說，或許並不能深刻了解日本侵華及不同民族間的差別意涵，但在日常生活當中，林洋港卻可以體會身為中國人和日本人有著差異。在就學上，臺灣人和日本人就讀不同的學校；生活上，在務農家庭中，已經貧困的生活仍必須上繳大量農作物給日本統治階層¹⁰⁸，林洋港生長的頭社村中又有會在喝醉後毆打臺人的日本警察，都讓林洋港有切身的感受，並且對於日本有著負面的印象，在語言上，雖然日本殖民教育希

¹⁰⁶ 鍾理和，1959，頁7。

¹⁰⁷ 官麗嘉，1995，頁24。

¹⁰⁸ 農家捨不得作物被徵收，就將作物藏到山中，日本警察則會要求原住民協助搜山。

望經由日語的推廣和敕語教育，讓臺灣人從日語中的日本民族精神同化為日本人，但日語並未進入臺灣人的日常生活，臺人日常生活中仍以臺語為主要語言，以上的諸多因素都可能讓從小聽父親告知中國人的身分，以及統治者負面的形象的林洋港，不僅沒有產生身為日本人的身分認同，還可能將負面要素投射向日本，進而強化了林洋港對於身為中國人的身分認同。

二、對日本的印象

林洋港在 18 歲之前都是接受日本教育，其生涯也不斷使用日語當作獲取新知的工具，但林洋港卻未對日本產生身分上的認同，而是在中國人的身分認同上看待日本的優缺點，林洋港赴日前，在日本統治下物質生活並不富裕，長輩以中國人自居，學校師長也多為臺籍人士，對於日本的印象除了父親所說的日本侵華外，則多由對警察的印象而來，而林洋港對於日本警察的印象則多為隨意抓人、刑求，而遭受冤枉後也是不了了之，¹⁰⁹加上日本對臺灣信仰的介入，也因此林洋港在童年時期並未產生日本人的身分認同，甚至是有著較為負面的印象。

1940 年，林洋港赴日時，日本正在戰爭時期，民間也在戰時體制的壟罩之下，政府徵招民眾至軍工廠工作，林洋港就讀的昌平中學多為較貧窮的學生就讀，並且白天也要工作，因此林洋港並未在徵招的行列之中，而林洋港接受家中的援助，不需要半工半讀，而將時間多花在學業之上，也獲得十分優異的成績，但報考大學仍名落孫山，並沒有機會進入日本的高等菁英教育，成為其中的一分子。

在物質環境方面，由於在戰時體制下，糧食為配給制，林洋港在日本的生活也受到很大的影響，在物質上僅能勉強溫飽，到 1944 年時，日本戰況不利，日本國內經濟環境更加糟糕，林洋港在日本的物質生活無法獲得充分的滿足。而在精神教育層面，林洋港在臺灣已有了對中國的認同，而到日本留學時，對於在校所吸收的內容以四書為最深刻，延續了林洋港對中國文化的接觸，校長橋健三也批判日本政府的侵略行爲，認為日本的侵略是種霸道的展現，而非其所推崇的王道，並講述日本軍人在滿洲國的橫行霸道，對於日本政府有著諸多的批判，或許更強化了林洋港對於日本殖民的反彈和對中國人身分的認同，雖然林洋港並沒有被同

¹⁰⁹ 林洋港，1992，頁 14。

化爲日本人，但也並不仇視日本，林洋港擁有不少日本友人，也曾出訪日本造成轟動¹¹⁰，林洋港認爲日本有許多精神是值得學習的，但同時日本過於壓抑的民族性也存在不少缺點，不該盲目尊崇或是排斥。

林洋港的家庭教育塑造的林洋港最初的身分認同，由於物質生活的貧乏和處於被壓迫的階級，林洋港沒有多餘的選擇和機會去探索其他的選項，在日本殖民時期的中學和大學考試的落榜以及日本警察囂張的形象，堅定了林洋港自身的定位，而獲得較多成就感的公學校時期與昌平中學時期，記憶所及的師長不是臺籍人士就是中華文化的提倡者，林洋港在大學時研讀日本統治臺灣的歷史時發現，日本對臺的抗暴行動都以軍事鎮壓處理，臺人和日人在教育機會、司法層面、進入政府部門的機會以及升遷和待遇上都有極大的差別，¹¹¹在林洋港的回憶中，雖然日本時期有良好的治安，卻是在警察嚴刑逼供下的結果，¹¹²這些觀念可能都強化了林洋港的中國認同，也因此，即使在 18 歲之前都在日本的教育下成長且不會說普通話的林洋港，卻不斷的吸收中國的傳統文化並對中國保有認同。

貳、中國認同的強化

一、光復初期的失望

臺灣光復之後，中華民國政府來臺，臺灣人民滿懷希望的「迎王師」，但所見卻是穿草鞋、背鍋盤、軍紀渙散的軍人，林洋港認爲當時臺灣人能諒解經歷多年抗戰，政府有著財政上的困難，但是國民政府的接收官員表現的態度卻大大的傷害的臺灣人的情感，林洋港回憶民國三十五年時，福建省籍的分局長在南投召開座談會，以恩人的姿態說道：「沒有我們，你們給日本人壓迫…，你們以後一定要效忠政府，聽我們的話。」¹¹³，加上接收官員撈一票就回大陸的心態和不良情治人員的各種行爲，讓當時的臺灣人對國民政府普遍產生失望，再加上二二八事

¹¹⁰ 1981 年林洋港奉命赴日訪問，造成熱烈回響，但也被有心人士認爲鋒頭太健，而有諸多中傷。

¹¹¹ 官麗嘉，1995，頁 45。

¹¹² 林洋港，1993，頁 14。

¹¹³ 林洋港，1992，頁 16。

件的發生，讓部分臺灣人不僅對中華民國政府失望，甚至引發省籍上的衝突，使得這些對中華民國政府的不滿，被導向因為省籍的不同而產生的壓迫，而這種將問題歸咎在原生的省籍上的觀念，則一直不斷持續被論述。

林洋港對於政府的失望並沒有被引導至省籍的不同之上，首先在光復之初，擺脫日本壓迫之後，林洋港對於未來十分樂觀，希望能進入政府機關，為同胞服務，雖然政府接收人員的態度不佳，但林洋港當時是學生身分，忙於課業與家中農事，與政府人員接觸並不頻繁，又有家庭的經濟壓力，可能都使林洋港務實的將養家糊口放在第一位，而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因為資訊傳播的不完整，當時的林洋港並不清楚事件之經過，但曾親眼目擊請願的人民遭到軍警攻擊，學校的課程也受到影響，林洋港決定回鄉，而林洋港的家鄉並未受到重大影響，在臺北時林洋港雖遭到盤查，但也是有驚無險，因此二二八事件對林洋港並未造成實質上的傷害，林洋港事後回憶，認為當時受到大陸局勢影響，物價通膨、軍人紀律渙散、來臺接收的政府官員態度不佳且以取巧方式獲得金錢，讓臺人失望、不滿，但更重要的是臺灣已建立了法治的觀念，而來臺的中華民國政府人員對法治觀念並不熟悉，因此查緝私菸的槍擊事件才會引發如此大規模的爭議，¹¹⁴可見林洋港認為所謂的省籍情結，問題並非出在省籍的不同，而是在法治觀念的不同，只要法治觀念能夠建立，則可和平共存，對林洋港而言，中國是認同的族群的國家，而省籍情結則是在國家之下。林洋港的中國意識雖在光復初期受到挑戰，但並未改變林洋港的自我認同，林洋港對於中國的認同以及「光復」的喜悅，大過於對政府的失望，而儒家思想影響林洋港的內斂、順服的想法，加上並非實際受害者與有現實經濟的壓力，可能都使得林洋港做出服膺於現狀的決定。

二、中華民國政府與臺獨

（一）中華民國在臺灣

¹¹⁴ 官麗嘉，1995，頁 41。

從小聽到長輩對中國打敗日本的渴望，在臺灣真正光復時，對林洋港來說，是有著想像歸屬感的中華民國的到來，雖然對於光復初期的社會現象有著諸多不滿，但並未改變林洋港的中國意識，林洋港在大學畢業後，為求生活上的穩定而考取了公務員的資格，開始了林洋港持續一輩子的公務員生涯，林洋港認為，中華民國政府的播遷來臺，帶來了完整的政府、議會制度、文教、技術人才以及資金和情治人員，雖然有個別的不良分子存在，但情治人員和警察防範了中共匪諜的滲透，臺灣光復時電力設備遭到破壞，也是孫運璿帶領臺電人員盡快修復，而文教和財經專業人士，幫助了臺灣的教育普及和經濟發展，人力、器材、資金的到來，配合人民的共同努力，才創造了臺灣的經濟奇蹟。¹¹⁵對中華民國政府來臺後對臺灣的貢獻，林洋港給予正面的評價，林洋港進入政府機關服務，開始了 50 多年的公務員生涯，在南投基層多見到樸實單純的老百姓，在若干年後獲得重用，成為政府要員，又與歐樹文、謝東閔等志同道合的同志交好，於體系內獲得良好的經驗和仕途發展，可能都使林洋港強化「認同中國的臺灣人」的意識。

林洋港身為政府官員，言行舉止都有其立場，但也不難看出林洋港所看到的世界和抱持的態度，林洋港的論述多以政府官員的角色出發，回應其所知道的建設、改革和決策內容，即使不如內心所想，仍會以工作上的角色為主，例如林洋港在司法院長任內訪問美國時，面對外界質疑郝柏村和李登輝的聲音，林洋港並未選擇倒向任何一方，而是以中華民國司法院長的身分為總統與行政院長辯解，可以看出林洋港對於工作上的重視大於個人好惡，而對於工作上的投入，除了林洋港本身擁有的責任感和儒家的入世觀外，主要還是在認同中國民國政府的大概念下，進行各種抉擇。

（二）糾結的統獨問題

統獨問題是臺灣重要的政治議題，對臺灣的政治生態和國家走向影響深遠，林洋港反對臺灣獨立，除了在情感上認同中華民國外，在現實面上，林洋港也提出以下 5 點反對臺獨的理由¹¹⁶：

¹¹⁵ 林洋港，1992，頁 15。

¹¹⁶ 林洋港，1993，頁 19。

1.不少鼓吹臺獨的人士認為，臺灣人和中國人為不同種族，對於已經在臺灣落地生根的外省人士十分不公平，且造成實質上的壓迫。

2.臺灣和中國在語言文字、宗教信仰、歷史文化方面十分相似，中共必然不會允許臺灣獨立，否則將面對在各方面都有差異的西藏、新疆、內蒙古問題，故中共將會採取激烈的手段，結果可能引發戰爭。

3.臺獨的訴求正好給予中共引發戰爭的藉口，而中共只需封鎖臺灣海峽，臺灣就難以負荷。

4.臺獨除了必然使國防經費增加，同時也會喪失廣大的中國市場，對臺灣經濟有負面的影響。

5.海外華僑認同中華民國政府的不在少數，一旦臺獨，將喪失諸多華僑的支持。

林洋港認為統獨的問題是由省籍情結而來，而省籍情結是由於中華民國政府初期管理不當所致，部分外省人認為自己是拯救臺灣人的救世者，造成部分臺灣人則認為外省人是外來的移民，和日本帝國主義一樣來佔據臺灣，林洋港認為這都是錯誤的觀念，臺灣的經濟奇蹟是在本省同胞的配合和中華民國政府帶來的大量人才和資金下，雙方共同合作努力的成果，不是任何一方單獨能達成的，何況在有中共這共同敵人的情況下，內部分裂是明顯不智的。除了省籍情結對國家認同造成疑義外，臺灣的社會風氣丕變也是促使分裂的原因之一，林洋港認為，臺灣社會風氣愈趨尖銳，這是由於不了解民主政治的互相尊重，而將自由、民主認為是「只要我喜歡，有甚麼不可以」的個人主義，一旦得不到想要的結果，就會採取激烈的言行，因此人際關係愈來愈惡化，使得團結的風氣不再。

林洋港自認是中國人也是臺灣人，但林洋港的「臺灣」並不帶有國族意識，而較相似為地域的概念，本省人和外省人都是有著相同文化、歷史背景、血緣的中國人，在這個基礎上，林洋港對於中華民國為繼承中國正統的合法性並無疑義，中華民國政府對臺灣光復後的建設也確實有著積極且正面的貢獻，一方面在情感上對中華民國政府的認同，另一方面反對臺獨的不切實際，林洋港對兩岸

關係提出「不可獨，不急統」的看法，臺獨的危險與未來的不確定性太強，是絕對行不通的一條路，但統一也並非只是要恢復中國之名，林洋港對中國雖有憧憬卻也沒忘自己的故鄉在臺灣，林洋港認為統一需要符合以下幾點方能進行：

- 1.統一必須在符合民主、自由、均富的前提下進行。
- 2.統一的時間要看中共政權的轉變而定，沒有時間表。
- 3.強化臺灣的實力，以促使中共轉向民主、自由的道路。

林洋港認為的統獨問題，並非臺灣或中國的國家認同，而是因應省籍衝突而導致的分離意識，比起原生因素的省籍衝突，林洋港更重視現實層面的考量，這也十分符合林洋港務實的風格，林洋港認為在「統、獨」的思考模式中，兩岸的來往方式和政策都受到相當大層面的限制，與其討論統獨，不如在內部先團結合作，強化臺灣的實力，面對中共 11 億的人口，如果臺灣再分彼此、內鬥不斷的話，又如何能面對中共這敵人呢？與其高談闊論，在臺灣實力衰弱後，統也統不了、獨也獨不成，不如先處理好臺灣現有的問題，當有了力量才有辦法決定臺灣的前途。¹¹⁷

參、官長的影響

林洋港對於道德修養和人際互動十分重視，不斷提及中國傳統道德、內心的修持和團結合作的重要，內在的心性是影響林洋港決定的重要的因素，林洋港在省主席任內，即使會影響到黨內對林洋港的評價，也情願與上級發生衝突，而不願意馬上開闢二重疏洪道，就是一個重要的例子，林洋港亦提及在政治生涯當中，最難過的是無法事事滿足民眾，有時必須拒絕有所求，卻於法不合的事情，以及因為立場而和故人、親友有所對立，¹¹⁸可見人情往來對於林洋港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一環，在合乎法律和自身立場的基礎下，情感可能是林洋港做出決定的重要關鍵。

林洋港對於價值觀的抉擇十分固執，觀看其生平認同和經歷都沒有出現太大的轉變，對於日本的認同感本就不強，讓林洋港在中華民國政府來臺時，並未

¹¹⁷ 林洋港，1992，頁 26。

¹¹⁸ 林洋港，1992，頁 161。

受到衝擊，更因為對中國的認同而充滿期待，雖然光復初期經濟、社會、政治上的不安定，但在林洋港進入政府機關後，開始強化了對中國的認同和政府的合法性，除了因為認同政府的努力外，人際關係的情感因素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林洋港常提到他在人際關係互動上得到的照顧，並且時常感懷於心，可能也因此更加深了林洋港的認同感，林洋港常提到的人物有以下幾位

一、蔣中正與蔣經國

從小就聽長輩講述蔣中正帶領中國抗日，對幼時的林洋港來說，蔣中正的以一個抗日英雄的形象存在著，而林洋港真正和蔣中正有接觸是在 40 歲當選縣長之後，由於在選舉過程中表現傑出，故省黨部建議蔣中正召見林洋港並給予勉勵，兩人相談甚歡，此後蔣中正每到日月潭就會召見林洋港，林洋港對蔣中正的印象，由戰爭英雄轉為平易近人的慈祥長者，蔣中正亦勉勵林洋港要盡心盡力、造福百姓，遇有天災也會詳細詢問表現出愛民之心，對於林洋港的意見也能聽取接受，不會固執己見。¹¹⁹

而蔣經國對林洋港的影響更遠大於其父，林洋港曾提及不少關於蔣經國的事蹟，林洋港於 1972 年擔任省政府建設廳長開始和蔣經國有較多工作上的互動，蔣經國指示了多項基礎建設並曾說道：「事情雖然小，但卻是全面性的，如果把它解決，就會有眾多民眾受惠。」同時對林洋港在臺北市長任內的建國南北路高架橋、翡翠水庫的興建和信義計畫區的開發，蔣經國都以「對民有益，就盡力去做」的想法來支持林洋港，林洋港印象最深刻的是在 1979 年時，雲林縣發生山崩，在臺北的蔣經國也等到三更半夜，得知事件解決後才去就寢，蔣經國在公事上的信念和對林洋港的支持，都讓林洋港感懷於心。蔣經國的熱情和真摯的性情也林洋港十分敬佩，蔣經國常在基層關懷民眾，無懼維安疑慮，認為以誠待人，民眾必會有所回應，對於下屬也是關懷備至¹²⁰，同時對於戒嚴時期，對於有偏激言行者的

¹¹⁹ 官麗嘉，1995，頁 97。

¹²⁰ 南投縣第一任縣長李國楨在餐敘間向蔣經國提到有風濕的毛病，蔣經國在三周後就請林洋港轉交金門的益壽酒給李國楨，李國楨因此十分感激。

處理¹²¹，蔣經國認為人才養成不易，不應以法律制裁，只要對國家、人民盡心付出，必能感動他們。¹²²在林洋港眼中的蔣經國是位至情至性的領導者，真心誠意地為國家、人民付出，在性格上也擁有熱情、幽默、寬容的特質，這些特質和行事風格也同樣能在林洋港身上發現，身為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的最高領導者，兩蔣父子深深的打動了林洋港的內心，情感上對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的認同，讓林洋港想保護在兩蔣時期團結的國民黨和質樸的社會風氣，也影響了林洋港面對國民黨內部重重問題的各种決定與四處提倡重整社會道德的決心。

二、歐樹文與謝東閔

歐樹文年長林洋港 20 歲，是林洋港進入南投縣政府擔任行政課員時的上司，也是公職服務的啓蒙恩師，歷任南投縣民政局長、主任秘書、代理縣長，於 1973 年退休，其後服務於仁愛之家，照顧貧苦無依的老人，兩人持續十多年亦師亦友的關係，林洋港對歐樹文的敘述為：「歐先生大公無私、堅守立場、犧牲奉獻，對擔任公職有神聖感，倘若當時我沒有親炙教益的機會，失去這種體察，或許不會繼續服務下去。」¹²³歐樹文待人謙和有禮，同時也不失掉原則立場，對於是非對錯相當堅持，其人品和盡忠職守的特質，讓甫出社會的林洋港，有了學習的對象和目標。

謝東閔年長林洋港 19 歲，為本省籍政治菁英，中學時到中國留學，臺灣光復後隨中華民國政府回臺，歷任高雄縣縣長、省議會議長、臺灣省省主席、中華民國第六任副總統等政府要職。林洋港擔任南投縣縣長時和當時為省議會議長的謝東閔開始往來，謝東閔對林洋港十分賞識，也盡力支持林洋港的施政，在林洋港南投縣長任期即將屆滿之時，謝東閔為臺灣省省主席，就調任林洋港為建設廳長，林洋港對此十分感激，也因為當時各廳處長只有林洋港真正住在中興新村的宿舍，兩人便常一起走訪基層，謝東閔對林洋港提到不少人生的體悟，鼓勵林洋港要樂觀、進取同時也要沉著穩重，在公事上謝東閔對下級十分尊重，即使身為長

¹²¹ 1986 年立委選舉出現辱罵蔣經國的宣傳文宣。

¹²² 林洋港，1992 頁 61。

¹²³ 時報周刊，445 期。

官也不願意以權力命令他人服從，讓林洋港印象非常深刻，謝東閔也影響了林洋港在 1990 年發表退選聲明的決定，同時因為謝東閔 1993 年求見李登輝卻不得接見，讓尊重長輩的林洋港對此頗有微詞。事實上除了歐樹文、謝東閔外，林洋港也和黃少谷、蔡鴻文、袁守謙等人交好，這些人共有的特質就是忠於黨國並且在人格操守上有所堅持，由林洋港對友人、長輩、長官的回憶中，充滿了道德操守的讚許，可見林洋港在選擇來往對象時，內在品德是首要因素，並且所見的都是中華民國政府要員對臺灣的付出，但在李登輝的回憶中，蔡鴻文並不支持林洋港，林洋港也曾因直言不諱而使蔣經國氣惱，¹²⁴但在林洋港的回憶與評價當中，卻都是充滿正面積極的過程。

第三節 想像中的中國

林洋港童年時期在臺灣成長，13 歲赴日留學，在臺灣光復前回到故鄉，其後就學、進入政府機關工作到退出政壇，林洋港在 1996 年前從未踏足中國大陸一步，但林洋港卻有著深切的中國認同，以身為中華民國國民自居，這個中國的形象，正是林洋港在吸收的各種資訊中所統整出來的「想像的中國」。

壹、接收的訊息

一、「邪惡」的日本

林洋港對於中國的想像，首先在被壓迫的環境下興起，童年時期的林洋港，在認知上被長輩教導日本是侵略臺灣的殖民者，物質生活環境不佳，上學要打赤腳步行 2.5 公里，並要幫忙放牛、除草、堆肥等粗活，大部分的收成又要上繳給統治階層，生活環境的艱苦，可能讓林洋港投射於統治階層。在實際面上，林洋港童年時與日本人少有接觸，有實際接觸者為村中的日本警察，除了到處要求招待外，也會毆打村民，日本警察又有使用暴力、刑求的事蹟；在社會文化上，日本在語言文字、宗教信仰都有箝制，攻克南京後張燈結綵的慶祝也讓有中國意識的

¹²⁴李登輝總統訪談錄二－政治新星，2008，頁 112。

林洋港家庭憤怒不已。林洋港除了接收到日本的惡行事蹟的訊息外，在現實生活中也有了親身體驗，印證了長輩對日本的批評與怨言，赴日留學時，林洋港收到更多日本軍方胡作非為的訊息，在生活經驗上，日本將天皇神格化，並向人民宣導若日本不向外侵略必然滅亡的論述，同時認為日本民間生活的困苦，卻執意發動戰爭的做法，讓身為被壓迫一方的林洋港非常不以為然，讓日本威逼臺灣的形象愈趨鮮明，在日本殖民時期的臺灣人來說，這種因為反對日本而愈加強烈的「祖國愛」並不少見，葉榮鐘（1900-1978）於其回憶錄中寫道：「我們出生於割臺之後，足未踏祖國的土地，眼未見祖國的山川，大陸上既無血族，亦無姻親。除文字歷史和傳統文化以外，找不出一點聯繫，祖國只是觀念的產物而沒有經驗的實感。但是我們有一股熱烈強韌的向心力，這股力量大約就是所謂「民族精神」。…假使日人在這五十年的統治期間，能切切實實施行所謂「一視同仁」的政策，不歧視，不欺凌，那末臺人的民族意識，或不致如此強烈。」¹²⁵對日本的反感與無力反抗，讓林洋港將希望寄託在與「邪惡的日本」對抗的蔣中正身上，同時對中國產生了歸屬感，期待能從認同中國的過程中得到精神上的救贖。

二、進入中國的脈絡

在日本殖民時期的各種不如意和被壓迫，讓林洋港沒有建立起日本認同，而走向中國的認知脈絡當中，林洋港在退休前雖未前往過中國大陸，但從小在中國意識濃厚的家庭中成長，讓林洋港對於中國有了較為熟悉的概念，由於臺人對日本的無力反抗，以及對日本的殖民在意念上的反動，讓林洋港於是能夠接受長輩給予的帶有希望的中國論述，這種在壓迫中的希望，帶給林洋港相當強烈的認同感，因此林洋港在光復之時開始主動學習國語¹²⁶，並且希望能進入政府機關為人民服務，可見林洋港對於脫離日本殖民後的未來，是感到充滿希望的。故當接收人員來臺，表現出拯救者的態度，並在接收的過程中以不正當的手法獲取金錢，臺灣人被認為是受日本教育下有待中國教化回歸的民族，加上其後發生的二二八事件，使得省籍情結問題愈趨嚴重時，寒蟬效應也使得一時間政治的議論被視為禁

¹²⁵ 葉榮鐘，1977，頁 212。

¹²⁶即漢語，1932 年中華民國教育部頒布《國音常用字彙》後，被採納為中國的官方語言。

忌。由於剛脫離日本的統治以及身為學生對現實的無力，林洋港雖對光復初期的政府官員感到不滿，也只是順服的接受現狀，他乃對中華民國抱持希望，未以新的殖民者的角色來看待中華民國政府，而現實層面的因素，林洋港進入公家機關，遇到了熱情的民眾、尊敬的長官，加上從小聽聞的蔣委員長和勤奮的蔣經國，讓林洋港對於政府的印象發生轉變，也因為有了政府官員的立場並成為其中的菁英分子，林洋港完全的進入中國的脈絡之中。

林洋港是個有著非常務實觀念的人，兩蔣對林洋港來說是敬佩的精神指標，對於國民黨也有著相當深厚的情感，在蔣經國過世後，社會愈趨低落的道德觀，讓林洋港懷念光復後臺灣淳樸的社會，同時面對國民黨內部分裂的挑戰，林洋港一直想維持黨的團結以免造成社會的不安，但在黨內不斷鬥爭的氛圍下，林洋港冒著被國民黨開除黨籍的風險，參與難以勝利的總統選舉，其後果然被國民黨以違反黨紀參選為由開除黨籍，可見林洋港對臺灣現實的擔憂，更勝於追求團結和對國民黨的情感，而林洋港的中國觀，是以國家，也就是中華民國和其所在的臺灣的繁榮為最優先目標，其後才追求以自由、民主為基礎的統一的可能性，林洋港認為，中國是屬於中國人而非任何黨派，相信所有的中國人都希望兩岸能在理性、和平、對等的原則下合作、交流，以建立一個民主、法治、均富的中國。¹²⁷

貳、中國的形象

臺灣人對於中國的情感是十分抽象卻強烈的，臺人在日本的統治下對於「祖國」抱持著幻想，吳濁流（1900-1976）對此曾寫道：「眼不能見的祖國愛，固然只是觀念，但是卻非常微妙，經常向引力一樣吸引著我的心。正如離開了父母的孤兒思慕並不認識的父母一樣，那父母是怎樣的父母，是不去計較的。只是以懷戀的心情愛慕著，而自以為只要在父母的膝下便能過溫暖的生活。以一種近似本

¹²⁷ 兩岸雙贏月刊，第一期。

能的感情，愛戀著祖國，思慕著祖國。這種感情，是只有知道的人才知道，恐怕除非受過外族的統治的殖民地人民，是無法了解的吧。」¹²⁸

那未曾清晰卻存在的祖國愛，亦深刻地存在於林洋港身上，林洋港對於中國的印象，是對抗欺凌臺灣人的日本的祖國，是從小閱讀的中華文化的源流之國，但林洋港並非一心想回到祖國懷抱的統一派，林洋港被歸類為擁有中國意識的非主流派與本土派的李登輝相抗衡，事實上這樣的分類未必恰當，由林洋港在生涯中的諸多演說可以發現¹²⁹，不同於急統派認為臺灣是中國神聖而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應該盡速統一，林洋港接受的中國論述，並非以中國大陸為本體的「回歸」祖國懷抱式的想法，而是以身為臺灣居民的中國人，期許未來能解救在中國大陸同胞的概念，認同中華民國繼承了中國的正統，而非統治大陸的中國共產黨，亦即真正的中國就是中華民國。林洋港未曾踏上中國大陸的土地，卻可以以想像來認同中國，原因可能包含因反動而愈趨強烈的民族情感以及接收中國傳統文化後的美好想像，事實上在二戰期間的中國與臺人想像中仰慕的祖國有不小的落差，吳濁流自述其抵達大陸的感受：「登陸後，我發覺到一句話也聽不懂。雖是自己的祖國，但與人感受卻完全是外國，…只不見三四天的見聞就使我深感做一個中國人的悲慘。洪水般的野雞，乞丐的奔流，都是為求生存的人們的可憐影子。相反地，外國人都是暴君，橫蠻不可理喻，正是支配者的一副嘴臉。」¹³⁰

可見在當時的中國大陸上，吳濁流發現與祖國之間在語言上的差別，所見的祖國被外國人無情的踐踏，喪失尊嚴，這種想像與現實的差距，讓對祖國有著孺慕之情的人都難以接受，但也未必會使這些知識份子拋棄對祖國的情感，陳翠蓮以黃旺成、吳濁流等人為例，發現即使親眼見到祖國的落後，並未削減他們對中國的情感，並且使他們轉而為祖國辯護，將不利的情況歸為被帝國主義的壓迫。¹³¹ 林洋港未曾親身到到達中國，因此未被現實破壞其想像中的中國，光復初期的混亂也曾使林洋港對政府感到失望，但同樣的林洋港以「可以體諒多年戰亂的困

¹²⁸ 吳濁流，1988，頁 40。

¹²⁹ 林洋港大量的演說內容收錄在《阿港伯開講——重建時代道德》一、二輯當中，包含對國民道德的期許以及兩岸關係的想法。

¹³⁰ 吳濁流，1988，頁 120-123。

¹³¹ 陳翠蓮於〈想像與真實：台灣人的祖國印象〉一文中提及吳濁流等人為心中祖國辯護的因由，收錄於《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周年紀念論文集》。

難」，為自己的失望找到出口，而後林洋港將臺灣的光復和光復後的經濟快速成長歸功於中華民國的存在。

在步入公職生涯開始，林洋港看到了政府積極的一面，同時對於黨內同志、長官的人格修養的佩服，讓林洋港對初期政府的失望很快的消解掉。林洋港對於中國的認知脈絡十分清楚，幼時在臺灣對中國有著懵懂的概念，在赴日時獲得更多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知識，也因為反日的情緒讓林洋港走向對祖國的期待，直到中華民國政府來臺，林洋港的中國想像才真正得以和現實印證，也因為林洋港對中華文化的接觸和想像，讓林洋港在臺灣光復後，文化的銜接上，沒有太大的抗拒，也因為早期接受到的中國資訊，讓林洋港對中國有著想像，不論在情感的接受程度或是進入中國脈絡的難易度上，都驅使林洋港接受中國政府的來臺，務實的性格和對臺灣的情感，讓其雖認同中國，卻並不強調和大陸實際上的統一，反共卻不反中國，在保有臺灣的利益和自由民主的前提下，林洋港對中國的想像並不只是單純的統一和獨立兩個選項的未來，而期許有著第三條的道路出現。

中國意識濃厚以及重視現實層面的思維，讓林洋港和臺獨思想南轅北轍，林洋港無法理解為何同為中國人卻要在臺灣這個小島上分為彼此，也認為融入臺灣的外省籍同胞在此情形下十分無辜，並始終認為本省人與外省人都是中國人，而非新來的殖民者或是統治者的關係，同文同種的中國人卻要為省籍情結而讓臺灣陷入內鬨之中，對林洋港來說是十分不智的行為，只有真心誠意的互相合作，才有辦法在面對中共這個敵人時，壯大臺灣而不至於被併吞，林洋港在保有中國意識的同時，並存有濃厚的臺灣鄉土情感，在這之中尋求兩岸共存的契機。

第四節 個案比較

壹、李登輝的國家認知

一、身分的轉變

李登輝的國家認同並非單一而清楚，在時間軸上來看有著劇烈的擺盪，李登輝在親日的家庭中成長，對於日本文化十分推崇，日本的皇民化政策鼓勵臺人更改日本名字，李登輝也更名為岩里政男，黃昭堂認為：「在當時如果保持原來的姓名而不改的話，雖然會有種種的不利，但是改姓名最大的因素，還是本人希望能夠看起來更像日本人」¹³²。日治時期的李登輝對於中國沒有太多的認識，只在歷史課本上得知中國的片段訊息，自認在 23 歲前都接受正統的日本教育，為日本人的李登輝，接受著日本二戰時期日本的優越思想，日本的戰敗對李登輝造成不小的衝擊，但對日本擁有認同的李登輝，在日本戰敗後學業中斷，卻沒有留在日本，而將岩里政男的日本名字改回李登輝，並返回臺灣。李登輝回憶日本戰敗時，認為祖先由中國而來，因此同時有著臺灣人和中國人的身分，而中國人的身分則更大¹³³，李登輝從小使用的日語在光復後的臺灣社會中遭到禁止，對中文不熟悉的李登輝曾抱怨強制進入中文世界的困難，同時在比較日本與中國政府時，李登輝也曾回憶道沒想到是中國來統治臺灣，也沒想到中國的官吏都由下層而來，統治會如此之差¹³⁴，由以上所述，可以發現李登輝對自我認同部分的轉變與不確定，認同日本人的身分，卻也同時存在著對臺灣和中國的情感，回臺之時未想到是中國接手管理，比較後又懷念起日本的統治，以日本教育、文化為主體，崇尚形上學思辨的李登輝，面對較為陌生的中華文化時，在融入的過程中產生了抗拒，認同的不斷轉變，也顯現出李登輝面對臺灣主權轉手時的巨大心理衝擊。

臺灣光復後很長一段時間李登輝都專注在農業的研究之上，沒有觸碰關於政治的議題，但由於李登輝曾加入共產黨的紀錄，1971 年之前的李登輝是農復會中的技正，但因有台獨和共產黨的嫌疑而屢遭懷疑，李登輝甚至曾在機場無法入境以及被警備總部約談，1971 年，李登輝在王作榮的推薦下加入國民黨，王作榮說服李登輝與其抱怨國民黨及政府，不如加入其中，從內部改變國民黨，造福臺灣，¹³⁵李登輝也在加入國民黨後在仕途上有了良好的發展，民進黨人辦的《民進》刊物曾提到李登輝擁有相當強烈的臺灣意識，王作榮也認為李登輝有非常濃厚的族群

¹³² 黃昭堂，《台灣總督府》，（台北市：前衛，2002），頁 178。

¹³³ 李登輝總統訪談錄一---早年生活，頁 111。

¹³⁴ 李登輝總統訪談錄一---早年生活，頁 123。

¹³⁵ 王作榮，2003，頁 35。

主義和鄉土情感，李登輝在蔣經國時期不斷表現出反臺獨的立場，可見此時的以登輝相當務實的以進入國民黨後，實質的對臺灣付出為主旨，進行他的政治活動與行為，而李登輝在任職總統期間曾提出「中華民國在臺灣」，將中華民國的統治權限縮在臺、彭、金、馬，以示和中國大陸的不同與切割，此時的李登輝並未背離中華民國政府的存在，相繼成立統一委員會、中華文化復興總會並「終止動員戡亂時期」，顯現了以臺灣為主體，對兩岸關係的正視，並在一九九五年的康乃爾大學演說中，提及「台灣地區的二千一百萬中國人」之字句，¹³⁶但其後李登輝的臺灣意識和中國認同卻發生了衝突。

二、否定中國

1994年，李登輝接受日本籍作家司馬遼太郎的訪談時提到國民黨是外來政權、臺灣必須是臺灣人的並以出埃及的摩西來自比，1999年李登輝拋出兩國論引起臺灣社會和中共政權的譁然，李登輝認為兩岸的關係是特殊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不再只是爭論合法性的中國內部關係，¹³⁷必須先正視臺灣的認同問題，以確立臺灣的主體性與國際地位，才有辦法進一步發展兩岸關係，¹³⁸2003年李登輝召開「臺灣正名運動」大會，公開否定中華民國政府。對於李登輝的劇烈轉變，王作榮認為李登輝過去確實是擁有濃烈的鄉土情與中國意識的人，但因為中共和美國的輕視以及李登輝恩怨分明的性格下，李登輝將對中共的不滿轉向到中國整體之上。¹³⁹

日本是李登輝最先意識到的文化、國家、自我的身分，而日語是李登輝身為高知識份子的重要工具，但在京都就讀大學時，面臨日本戰敗、臺灣被割讓的衝擊，讓李登輝意識到同時身為中國人以及臺灣人的認知，面對中國政府統治上的壓迫和進入不同文化、語言的困難，李登輝原本順遂的發展面臨阻礙，讓李登輝不論在自身的仕途或是思考臺灣人的前途上，都開始強化身為臺灣人的意識，加入國民黨後的李登輝在一個中國的立場下步入政權的核心，成為第一任臺灣人的

¹³⁶ 李登輝，1995，頁 238。

¹³⁷ 陸委會編著，1999，頁 2。

¹³⁸ 李登輝，1999，頁 62-63。

¹³⁹ 王作榮，2003，頁 74-78。

總統，並決定擺脫中國的束縛，走出臺灣自己的道路，特別的是，2004年11月16日時，李登輝以身著日本武士服、持竹劍的造型為臺聯立委後選人拉票，顯示了李登輝對過去日本殖民時期接受的日本文化的尊崇，並且不同於中國，李登輝對日本的認同並沒有和臺灣人的意識有所衝突，也就是說李登輝的臺灣意識並非不能和其他的文化認同結合，但卻不可以是中國，李光耀認為李登輝是用日本的思考模式和日本人的歷史觀來思考問題，¹⁴⁰或許從李登輝由順遂的日本生活經驗，到不斷受到刁難的中國統治下，以及李登輝對中共和美國的不滿有關，李登輝的政治認同在時代的變遷中不斷地接收、抗拒、轉變。

貳、堅定與變動的認同

林洋港和李登輝同在日本殖民時期的臺灣生長，卻走向了不同的道路，身為中華民國政治菁英的兩人，各自代表著不同的認同與族群，林洋港是中國意識濃厚的臺灣人，幼時的教育讓林洋港受到中國文化的啓迪，在日本殖民時期的困苦生活讓林洋港在對日本的反彈下，以中國人的身分尋求自我的定位，相較於林洋港，李登輝對於中國的認識相當晚，由於親日家庭的生活順遂，李登輝對於日本治理臺灣的正當性並沒有質疑，對於中國也只有從歷史課本上的認知，到了日本戰敗時，才開始思考失去日本身分的自己在身分上的定位，並得出了「因為祖先來自中國所以自己中國人的身分更大」的結論，可見林洋港與李登輝在對中國的認知在時間點和內涵的了解有很大的差異，林洋港對中國的認知起源較早，是建立在對文化源流的熟悉與認同之上，並且對中國存有著正面的想像，相反的李登輝對中國的認識十分不足，在日本二戰時期對中國的負面觀感下，李登輝也難免受到影響，因此在日本戰敗後，林洋港本就沒有日本的身分認同，沒有包袱的迎接中國的統治，而李登輝卻面臨了拋棄崇尚的日本人身分的衝擊，李登輝並不知道臺灣會交由中國統治，但在喪失日本人身分，卻懷有鄉土情感的情況下，李登輝選擇了回到臺灣，而李登輝喜好不斷吸收、思辯的特性，可能促使其嘗試認同不熟悉的中國來確立自我的身分。

¹⁴⁰ 杜聖聰，1996/9/15。

進入中國的統治脈絡後，林洋港和李登輝都積極學習國語（漢語），希望能和中國的統治接軌，林洋港的中國認識和文化認同讓他較為正面且順利地接受，相反的李登輝雖然選擇了中國人的身分卻沒有深入的文化資本讓他深刻的認同，習慣使用的日文被限制，李登輝並抱怨學習中文的困難，同時因為參與過共產黨的經歷，讓李登輝在中華民國的統治下處於一個十分不利的狀態。林洋港和李登輝在仕途上的起步並不相同，但最後都走上政治舞台之上，林洋港所擁有的文化資本與認同讓他能容易融入中國文化的群體之中，並且產生的歸屬感與認同感，也因為對中國的認同讓林洋港在加入國民黨後被拔擢參加南投縣長選舉，讓林洋港成為實質上的受益者，強化了對中國政府的認同，李登輝由於曾參與共產黨的背景，讓他一直受到中央的懷疑，並對國民黨及政府有所怨言，但林洋港和李登輝在公務員的生涯中卻有不同的表現，林洋港開展了諸多建設卻也和中央發生過爭執，反觀李登輝則較為順服中央的決定，進入中國統治後受到壓迫的經驗，李登輝的作風十分保守，和成為總統後的作風大相逕庭，即使進入國民黨後也少有對政治提出見解或和高層意見衝突，相反的由林洋港對於國民黨內同志的敘述和政府積極作為的印象，可見林洋港對國民黨和政府相當的認同，林洋港期望所有中國人共同合作以建設臺灣，並沒有太大的意識到複雜的省籍差異或階層上的差別，行事作風相當的一致，因此林洋港在二重疏洪道和梨山果樹事件上，就曾對中央提出不同的見解而造成衝突。

蔣經國過世後，李登輝接任中華民國總統，林洋港和李登輝之間的差別才更趨明顯，李登輝在政治上仍保持著一個中國的立場，逐漸正視兩岸現狀，但在黨內卻傳出反對李登輝的聲浪，而李登輝也在黨內分裂的過程中逐漸獲得國民黨內的實權，林洋港因為人情因素並試圖塑造多元選項，而被以二分法劃分到與李登輝對立的非主流派當中，李登輝在總統任內對中國意識開始懷疑並且遠離，兩國論的拋出、支持臺獨的行為和對國民黨內的鬥爭，讓林洋港對李登輝失望，一方面是林洋港對國民黨的情感，對李登輝使國民黨的分裂與鬥爭手段不滿，加上李登輝對林洋港赴美時，為郝柏村辯解一事質問，讓林洋港對李登輝的心胸與格局感到懷疑，一方面是不斷刺激中國大陸的行徑讓林洋港感受到兩岸之間的緊繃關係，讓兩個人的政治關係十分緊張，但綜上所述可以發現，李登輝和林洋港都抱

持著濃厚的臺灣鄉土情感，不同的是李登輝在蔣經國過世後，逐漸對中國感到不滿，不論是中國的文攻武嚇或是政壇內的外省反對勢力，都讓李登輝產生「臺灣該由臺灣人作主」的意識，同時也表示否定中華民國政府甚至是外省人士的意涵，李登輝對於省籍情結有著敏感的意識，認為台灣長期受「外來政權」的支配，使得台灣人沒有自主性，並妨礙了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推行，¹⁴¹對林洋港「候選而不競選」的態度，李登輝認為林洋港是外省集團鬥爭中的棋子，將林洋港推上前線成為虛位的本省樣板，¹⁴²和林洋港的思考面向十分不同，李登輝認為需要確定臺灣的立場才可以在國際上正常生存；相反的，林洋港對臺灣的鄉土情感是包含在中國意識之中，並未分離出獨立的臺灣意識，林洋港不論在文化源流或仕途發展上都深受中國之正面影響，並不認為臺灣有分離的必要，更重要的是，臺灣與中國分離的可行性不足，不僅在歷史、文化、語言上難以切割，並且可能加劇內部本省與外省同胞的衝突，在刺激中共的情況下也可能引發戰爭，李登輝一直重視形上學的思辨，對高位階的認同不斷的搖擺激盪，最後得出「臺灣人的臺灣」的結論；相對的，林洋港並不認同李登輝所言的「臺灣人的悲哀」，林洋港認為臺灣是由本省與外省同胞共同努力發展，比起討論「我」是甚麼人，林洋港更希望能務實的面對「我」該怎麼做才會更好的現實。林洋港與李登輝兩名臺灣重要的政治精英，雖然有不同的文化內涵和認同，但都是以臺灣為發展的主體，對於如何發展的不同見解，讓臺灣在這個轉捩點有了不同的選擇。

¹⁴¹ 李登輝；中嶋嶺雄，2000，頁 221。

¹⁴² 李登輝，2001，頁 78。

第五章 結論

對在殖民時期被壓迫的臺灣人來說，由於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對於中國有著想像和依戀，期待未來能擺脫被壓迫的身分，也因為被割讓給日本有五十年之久，只存在想像中的中國無法給臺灣人實質上的幫助，臺灣人本身的主體性，在和日本殖民時期的各種政治參與的訴求中有了發展，因此我們無法以二分法來劃分這個時期的臺灣人是只擁有中國意識或是臺灣意識，他們往往是同時擁有，而在生涯中對兩者做出詮釋或是取捨。和李登輝相比，林洋港並沒有強烈而獨立的臺灣意識，這和林洋港接觸的文化、所在的環境以及由日本殖民轉至中國統治的文化銜接有關，林洋港相較李登輝更容易融入中國的脈絡當中，在光復初期的混亂時刻，林洋港對中國的情感讓其以體諒的心態為政府緩頰、辯護，同時林洋港選擇的友人表現出中國人的傳統美德，讓林洋港在此群體中如魚得水，更不會想到劃分中國人與臺灣人的差異，因此林洋港重視的一直是臺灣的發展與建設，而非任何形式的對抗與鬥爭，林洋港的中國想像是由本來就對中國正面的印象，以及對日本的負面觀感所形成，並在實際接觸具體的政府領導人和政黨同志之後，將想像中的中國具體化並且進入其中，正面的印象與經驗讓林洋港的中國意識加以強化與鞏固。

林洋港幼時對中國的想像，產生了對日本的差異認知，並由林洋港對於臺人經濟、就學上弱勢的認識，產生了不平等的認知，相反的李登輝並未產生族群的差異認知，雖然知道與日本人並不相等，但並未對其他族群展開想像與追尋。臺灣光復後，林洋港所想像、認同的族群到來，讓林洋港擺脫過去被壓迫的經驗，在差異認知被消除之後，林洋港在政府部門工作，對於內部新產生的省籍族群衝突則並不認同，也未再主觀產生對族群差異的認知。相反的李登輝又時並未產生族群的差異認知，在光復後才開始尋找並且想像，李登輝在接任總統之前一直表現出對中國的認同，並無公開發表族群間的差異認知，在接任總統後，李登輝開始有了「台灣人的悲哀」、「臺灣必須是台灣人的」等發言，表現出其對臺灣人和中國人之間的差異與不平等認知，此種認知應為長年累月所形成，而非接任總統

後的突然感觸，李登輝生涯中表現對中國的認同也可能是在政治生涯中的權宜之策。

儒家思想是中國的傳統思想，也是林洋港最核心的思想源流，其中的道德修養是林洋港最重視的層面，同時受到大學時期政治學系中對於自由、民主論述的影響，在《阿港伯開講－重建時代道德一輯》與《阿港伯開講－重建時代道德二輯》中，林洋港不斷闡述道德修身、自由平等的重要，對林洋港來說，除了有正確的觀念外，也要能外顯表達出來，一個和諧穩定的社會是因為每個人的努力而產生，而中國的傳統道德正是形成一個互助、尊重的社會的根本，更精確地說，林洋港對臺灣社會的期許是在知識水準進步的同時，保有對他人尊重並且務實的發展臺灣，因此林洋港對於分裂、鬥爭、謾罵格外反感，林洋港在政治生涯中以團結和社會的安定為第一考量，因此放棄了幾次爭取上位的機會，也讓林洋港在情感上懷念蔣經國時期，眾人皆團結為國的形象，面對臺灣愈趨民主、自由，卻愈以激烈的方式進行訴求，以及黨內的不斷鬥爭，讓保守的林洋港對臺灣的未來感到不安，使林洋港即使知道自己在參選上的劣勢和可能被開除黨籍的風險，仍希望再次的表達自身的訴求而參與總統選舉。林洋港曾引明代官員于忠肅的石灰詩：「鉛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以勉勵國人與自我砥礪；在追求真理正義之時，即使遭遇打擊，仍要堅定信念勇往直前，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最後「要留清白在人間」是林洋港在政治之路上對自己以及國人的期許。

林洋港從事政治的原因除了對臺灣有付出的使命感外，也包含了現實的要素，對家庭環境的不富裕的認知也讓林洋港需要盡早就業，也讓林洋港踏出了政治生涯的第一步，相較於複雜的國家認同、權術操作，林洋港更喜愛在人群中服務，林洋港對於人、事、物都報以感恩的心態，曾提到生涯中最感無奈的，是有時得對要求幫忙的民眾說「不」，對於長輩林洋港永遠使用尊稱，其所提過的人也多是抱持著感恩的想法，在言談之中少有對個人的人身抨擊，即使是在總統大選時期對選舉對手的批判，也頂多以「沒有誠信」形容。對自我嚴格要求誠信與公

正的林洋港，十分重視人際關係的互動，因此接觸擁有相同特質的友人們和長官，讓林洋港對於中國更加認同，也因為身為政府官員，對臺灣發展的印象包含政府的具體政策，也給予正面的肯定，這種印象和情感的認同強烈的影響了林洋港在政治上的抉擇，包含了由於人情而介入的二月政爭、因為黨內大老的勸退而發布的退選聲明，事實上都和林洋港的本意未必符合。

林洋港和李登輝在思想內涵、家庭背景、行事風格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台灣的光復也成為兩人重要的轉捩點，李登輝對日本文化充滿憧憬，卻被迫離開日本的脈絡當中，接觸中國文化時遇上不少困難與挫折，由順境轉為逆境的情況下，李登輝對於中國始終抱持著懷疑的態度，而林洋港對日本的統治有著負面的印象，並從小接觸中國的認同思想，在臺灣光復後，積極並順利地融入新的體系當中，揮別過去被打壓的陰霾，讓林洋港的心態和認同保持著積極的態度，對中華民國政府始終保持著認同。相同的是兩人都嘗試以臺灣為主體進行發展，在政府中為臺灣人服務，不同的是李登輝強調如果無法「正名」取得「臺灣人的共識」就無法決定「臺灣的前途」，而糾結在臺灣的認同問題之上，林洋港則更強調實質上臺灣要如何發展的務實選項，因此林洋港並不主動談及國家的認同問題，而將焦點放在如何改造臺灣社會與如何促成兩岸的實質合作，讓兩岸產生雙贏的局面。

參考文獻

- 王作榮，2003，《與登輝老友話家常》，台北市：天下遠見。
- 王甫昌，2004，《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
- 王開府，1986，《儒家倫理學析論》，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
- 卞敏，2008，《中華民族精神研究》，北京市：光明日報出版社。
- 石曉軍，1992，《中日兩國相互認識的變遷》，臺北：臺灣商務。
- 台灣教育會編，1995，《台灣教育沿革誌》，台北：南天書局。
- 呂正惠，2002，《殖民地的傷痕－台灣文學問題》，台北：人間。
- 李登輝，1995，《經營大台灣》，台北市：遠流。
- 李登輝，1999，《臺灣的主張》，臺北：遠流。
- 李登輝、中嶋嶺雄，2000，《亞洲的智略》，台北市：遠流。
- 李登輝，2001，《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台北市：印刻。
- 杜聖聰，1996，〈中共正在看李登輝會某修理幫他造勢的日本右翼〉，台北，新新聞。
- 李躍乾，2011，《日據時期臺灣留日學生與戰後臺灣政治》，北京：九州。
- 吳濁流著,林衡哲編，1988，《無花果－台灣七十年的回想》，臺北：前衛。
- 吳文星，1992，《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市：五南。
- 林洋港，1992，《政治與人生——我的處世哲學》，臺北市：文經。
- 林洋港，1995a，《阿港伯開講一輯》，臺北市：禾馬。
- 林洋港，1995b，《阿港伯開講二輯》，臺北市：禾馬。

- 林洋港，1996，《新領導：林洋港的治國藍圖》，臺北市：萬象。
- 林明玲，1995，《戴斗笠的父親——阿港伯》，臺北市：平氏。
- 林俊宏，2000，〈孔子德治思想的開展〉，台北：孔孟月刊。
- 林衡哲，2001，《廿世紀臺灣代表性人物》，台北：望春風文化。
- 官麗嘉，1995，《誠信——林洋港回憶錄》，臺北市：天下文化。
- 兩岸雙贏，1999，臺北市：社團法人中華台海兩岸和平發展策進會。
- 吳家駒、黃志民，2003，《新譯菜根譚》，臺北市：三民。
- 柯義耕（Richard C. Kagan）著，蕭寶森譯，2008，《臺灣政治家---李登輝》，台北市：前衛。
- 查正賢，2007，《論語講讀》，臺北：五南。
- 徐策，1993，《林洋港邁向總統之路》，臺北市：新高地。
- 徐立德，2010，《情義在我心：徐立德八十回顧》，台北：天下遠見。
- 荆子馨著，鄭力軒譯，2007，《成爲「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臺北市：麥田。
- 陸委會編著，1999，〈李總統登輝特殊國與國關係，中華民國政策說明文件。〉，臺北市：陸委會。
- 陸鏗，馬西屏，2001，《別鬧了，登輝先生！：12位關鍵人物談李登輝》，臺北市：天下遠見。
- 許雪姬編輯，2008，《日記與台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周年紀念論文集——上冊》，台北市：中研院台史所。
- 許蓉華編輯，1996，《細讀李登輝》，台北市：中央日報。

國史館，2008年5月，《李登輝總統訪談錄——早年生活》，張炎憲主編，臺北：允

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國史館。

國史館，2008年5月，《李登輝總統訪談錄二—政壇新星》，張炎憲主編，臺北：允

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國史館。

國史館，2008年5月，《李登輝總統訪談錄三—信仰與哲學》，張炎憲主編，臺北：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國史館。

葉榮鐘，1977，《小屋大車集》，臺中：中央書局。

張德文，1996，《先秦儒家思想三論》，台北市：五南。

張曼溪，1999，《林洋港的總統之路》，臺北市：麥田。

黃昭堂，2002，《台灣總督府》，台北市：前衛。

黃俊傑，2007，《德川日本〈論語〉詮譯史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2011，《臺灣史》，臺北市：五南。

黃奠華，1995，《我心如秤——阿港伯在司法院的日子》，臺北市：新新聞。

黃鈺淳，2010，《在台灣與中國之間——李登輝的思想脈絡及其中國認識》，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黃嘉瑜等編著，1987，《李登輝與林洋港》，臺北市：群倫。

閔建蜀，2009，《茶根譚的人生哲學：易、儒、道、佛合解》，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雷聲，1984，〈一位具有熱力的政治家〉，6/23。

新渡戶稻造著；吳容宸譯，2003，《武士道：影響日本最深的力量》，台北市：
先覺。

楊伯峻，1980，《論語譯注》，臺北：中華書局。

廖慶洲，1988，《林洋港的奮鬥與歷練》，臺北市：新新聞。

賴樹明，1993，《林洋港傳》，臺北市：希代。

鍾理和，1976，《原鄉人》，台北：遠行。

戴國輝、王作榮口述，夏珍紀錄整理，2001，《愛憎李登輝－戴國輝與王作榮
對話錄》，臺北市：天下遠見。

蘇起，2003，《危險邊緣－從兩國論到一邊一國》，台北市：天下遠見。

